

谢泳 / 著

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修订本

梁思成 金彭霖 胡适 费孝通 傅斯年 雷海宗 罗隆基
 董时进 钱端升 吴祖光 张东荪 王芸生 储安平
 张奚若 彭文应 钱锺书 王造时 陈寅恪 朱光潜
 顾颉刚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润教出版

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它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

上架建议：民国·人文

ISBN 978-7-5334-6012-9



9 787533 460129 >

定价：49.00元

谢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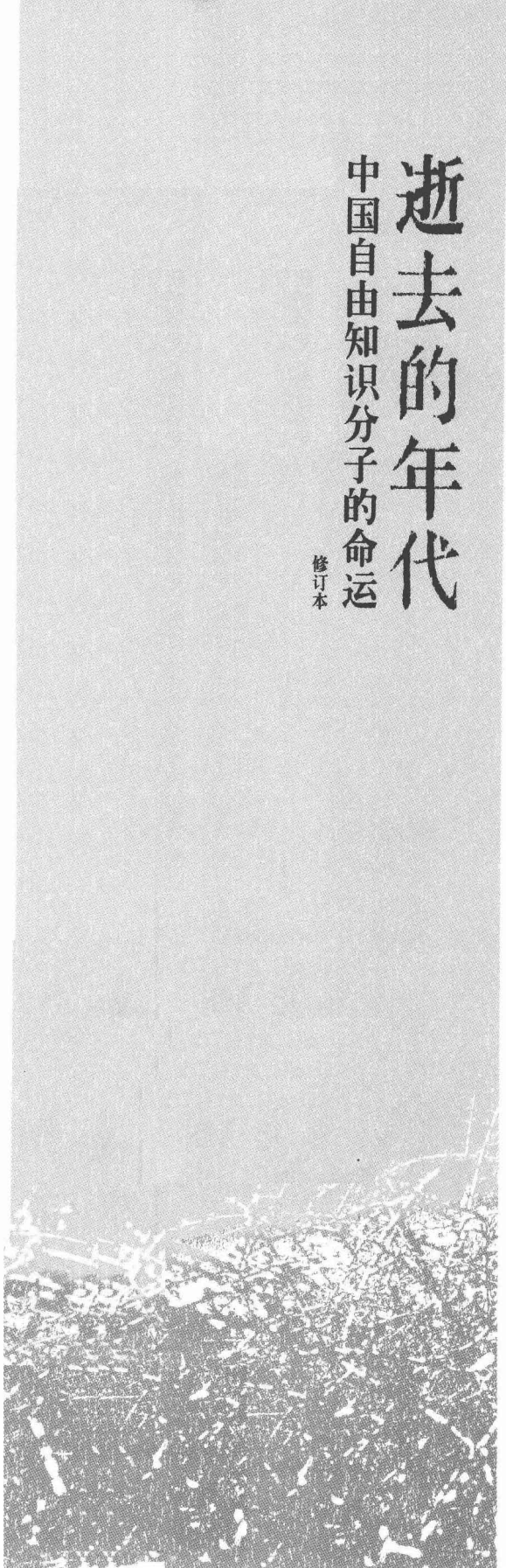
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修订本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著.
—修订本.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02
ISBN 978-7-5334-6012-9

I. ①逝… II. ①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4054 号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

谢泳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102600)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27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012-9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天凉好个冬

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而后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

——《普及吴祖光》

晚年冯友兰	2
晚年费孝通	5
寂寞钱端升	9
安福三才子	12
天凉好个冬	15
普及吴祖光	17
陈寅恪与周扬	19
张东荪这个人	21
吴晗的悲剧	26
过去的教授	29
遥想教授当年	34
常风先生	36
冯雪峰的悲剧	38

第二辑 毕竟是书生

1988年钱锺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锺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锺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锺书这样的

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

——《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42
杨树达的屈辱	46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50
汤用彤的顾虑	52
汤用彤写序	55
陈垣的转变	57
顾颉刚的恐惧	60
晚年贺麟	64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68
失望的王芸生	71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77
尹达的学术道路	80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85
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89

第三辑 无奈的群体

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再说张东荪》

再说张东荪	94
胡适与冯友兰	99
怎样评价傅斯年	103
吴世昌的选择	106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112
晚年曹禺	115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118

舒芜：回到起点·····	121
范文澜的无奈·····	125
谁给了周扬压力·····	127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129
无奈的群体·····	131
以小见大·····	134
三个教授的命运·····	137

第四辑 谁在思考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做人的底线》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148
为什么怀旧·····	150
钱锺书与西南联大·····	152
反认故乡是他乡·····	155
自欺欺人·····	158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160
论战的规则·····	162
做人的底线·····	164
学者的道德·····	166
胡适的学生·····	168
金岳霖的名言·····	171
北大往事·····	173
有意味的百分比·····	175
电视与学术明星·····	179
1959：谁在思考·····	181
西南联大与中国大学教育·····	185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191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198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205

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

——《历史教员的责任》

当明引不当暗袭·····	222
陈寅恪谈学术规范·····	224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226
学术批评要与人为善·····	228
知青的最后辉煌·····	230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233
历史教员的责任·····	235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237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245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249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255
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259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265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268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270
几则读书札记（七则）·····	274

第六辑 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他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胡适的直觉·····	292
胡适关心黄晖·····	295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297
怎样理解舒芜·····	301
储安平与季羨林·····	307
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309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316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319
钱锺书的科举观·····	321
关于金礼仁·····	324
费孝通的一封信·····	326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330
李拓之译《英译唐诗选》序言·····	336
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341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348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354
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357
重版后记·····	360

第一辑

天凉好个冬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不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位、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

“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

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道：“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羨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 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动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锺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他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 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

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 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 80 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

这种情感。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他在1987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绶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想叫后代望而生羨，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

信更好的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子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 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虽然他没有逃过 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 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 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书尾附一份 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不到半页，其中“政治学论著”只有 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

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要是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绶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有一腔热血。张忠绶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真是“天真”。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1947年到1948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年，钱先生50岁，多好的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还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

见到他写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8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年4月30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50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20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

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三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三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40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

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羨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岁左右）也不行。前几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羨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因了季羨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羨老的，写成一则短文：《季羨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羨老是1911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的时候，季羨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羨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年复刊时，季羨老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羨林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4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羨老与储安平是朋友。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羨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羨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羨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羨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時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

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羨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羨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羨老已经走过了85年的人生路，* 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羨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羨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1996年。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锺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过“普及钱锺书”，但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

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1959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笈、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年周扬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

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张东荪这个人

90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写了14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准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

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40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绝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10期210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

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 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同年 7 月党的 30 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 65 页，1987 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 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 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 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和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

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

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 50 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牵连，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已先后自杀。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 70 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 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 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 1949 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 63 岁。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

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年生人，40年代初也不过30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岗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

瑞。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4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过去的教授

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

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的旧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传统文化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 100 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待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

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待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像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

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莫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不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

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遥想教授当年

1994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

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常风先生

十多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两卷本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封面绿白相间，简洁淡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书署名为“高健编译，常风审校”。从译者的序中，不难看出他对常风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常风是谁？常风先生1995年是整整85岁高龄了，但精神一直很好。去年重病一场，他已不能下床，但思维和记忆都好。

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淳朴，没有一点火气呢？

常风先生是1933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在30年代是很有名的书评家，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刘心皇的《沦陷区文学史》中都记载了常风先生当年作为评论家的工作。但这一切常风先生都是在他晚年才知道的，记得当我把这些有关资料拿给常先生看时，他总是平静地对我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常风先生在30年代初期帮助朱光潜先生办《文学杂志》，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是《文学杂志》从始到终的参与者。在《新月》将关门的前几期，他又是一位主要作者，写了书评和一篇很长的散文。抗战军兴，常风先生留在北平，这一段时期他和周作人有过一些接触。40年代常风先生出版了《弃余集》、《窥天集》，还有一本编好的《茅茨集》，由于时局的变化没能出版。常风先生50年代初由北京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57年被划为右派。常风先生一回到山西即离开了文学界，没有参加

过一次山西文学界的活动，山西文学界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这位 30 年代介入过中国文坛中心的评论家。常风先生对这一切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以他当年给《新月》、《大公报》写作的资历重新回到山西文学界，怎么可能呢？他的甘于寂寞，期待平安，一切以平常心待之的人生态度，换得了晚年的安康。

常风先生对关心他当年文字生涯的年轻一辈十分感激，每次见他他总要问起邵燕祥、姜德明、陈子善、韩石山……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陷区，接着又不能写了。1957 年以后，还说什么写作呢？晚年能写了，但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风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回忆周作人先生》、《回忆叶公超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我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不动了。

今年陆灏、赵丽雅二位要重印他的《弃余集》，常风先生还写了前言，对年轻一辈，常风先生总是在默默中表示自己的感激。

冯雪峰的悲剧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大人物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三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比毛小 10 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 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 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入柏林后的大火，作于1945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都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集》第3卷348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些都还是个谜。

1946年2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194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第8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年起，毛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第二辑

毕竟 是书生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

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这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

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第2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6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

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年，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年12月4—5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页）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

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上和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也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鹭，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馀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

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已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

史系主任。

1951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自悔孟浪。（345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有关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对其他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等人，人们可以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对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看看 40 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 40 年代还曾做过一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

教授，他们都在名单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踟蹰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产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1968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卷3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毓泰做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 Plasticity（塑性）。”（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1944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1938年6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年再印。1983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1955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快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1938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

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 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13 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1955 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是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

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 119 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汤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开，一为大32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社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

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科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 17 通，陈寅恪的信 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 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 3 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 3 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 年 12 月 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3 个月后，1949 年 4 月 29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

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

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年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长（见该书624、625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顾颉刚的恐惧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刚就说过：“我以10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428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

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釞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釞《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页，1986年5月中华书局版）。50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唯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潮《顾颉刚年谱》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页）顾颉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

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

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 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 8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 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但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晚年贺麟

1982年，已80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

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道：“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3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74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31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黑格尔哲学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

我们要分析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钦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禱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页）这是1945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元。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4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生》一书中（商务1988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

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杨人梗、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의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의消失，不仅耽搁整整一代政治学의学者，使他们本人의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의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의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想资源의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의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80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

对红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年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入胜。”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年代以后，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年）、《政治学问题研

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年）、《唯物史观精义》（1947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4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本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以1900年和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岁和40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 and 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

年代末储安平《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3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

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 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 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 1948 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 532 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 252 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孙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 10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

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来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

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

1957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马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第58页）1957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

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据说70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芙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这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诒、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肯定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陞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才，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

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55 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煊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傅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 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 198 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 83 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 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 112 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至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 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作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年2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 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 年，26 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共 6 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

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

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

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捐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1946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10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与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

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 25 封，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 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 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 1646 页，1985 年 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颉刚本应是十分尊敬的。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 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鈇《顾颉刚先生学述》第 273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而现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潮

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5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寻找。1956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党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359页）。但在50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了20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釭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道：“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

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个人的特点，如跟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卷第4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949年，王瑶是36岁。王瑶比钱锺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4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王瑶32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年1月29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

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4位。同年4月4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王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40年代又入了民盟。用

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1948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在50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1951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

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页）痛哉斯言！

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锺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锺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锺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锺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锺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钱锺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锺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锺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锺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

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锺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锺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锺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入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锺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锺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锺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

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锺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锺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锺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年钱锺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锺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锺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锺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锺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锺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锺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年第2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锺书在给胡乔木的另

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政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锺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锺书处听到的，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锺书的友谊。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锺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锺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以钱锺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锺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锺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锺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锺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锺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锺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锺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锺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锺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第三辑

无奈的群体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 50 年代初的经历本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 1951 年，距今已 40 多年，按《档案法》30 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给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 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的，但千家驹 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蹋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

伪时期，张东荪坐了6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年出版的《观察》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卷13—17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反共”，1949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6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58、59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千家驹的回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213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两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叛国罪，无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暄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

忆张东荪的文字，对此也语焉不详，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该书 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国文化》第 10 期 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 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 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 卷 13 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

代许多方面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独厚的一位”（《负暄琐话续编》24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俞颂华文集》320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增刊第2册第30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1951年，还能躲过1957年吗？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

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做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年9月3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疚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年3月20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

《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二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38页）1931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16册）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17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

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册3102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10册2556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217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228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

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年5月1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73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还有一点是，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页，群众出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年最有资望。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页），容庚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

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吴世昌的选择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

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泰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颓废，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

(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政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40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津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锺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40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美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祚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见该杂志17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月18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章自我作践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

子，特别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怀疑是否他们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 1952 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 1954 年梁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 1952 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践自己，但在内心深处，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践自己的知识分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那种作践自己看成一种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 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而来的 1957 年，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 1952 年他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 年，梁思成在第 19 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 10 年！多么幸福的 10 年。”（17 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

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1957年。隔过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困惑。

晚年曹禺

在今年第3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到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读了万方的文章，人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50年代的《明朗的天》还是70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了。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

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页）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锺书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才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

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但40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说起：我已经80多岁了，90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多岁的老人，难道还要非等那个90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 10 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旭麓是 1918 年生人，比王瑶小 5 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 1949 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 50 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 年代初，在学术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

学术道路也有这样的特点。

1949年以后，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40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卷第21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这篇文章写于1947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起至1965年8月，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年代初，他还

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我是别有一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兰他们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

这一代 20 世纪 2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能进入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接舒芜的年龄（1922 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兄姚圻，舒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 40 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自由主义真谛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

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是否也应被反抗？他们还未深思。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40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1949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得了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的“个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范文澜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和反右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和“反右学”的研究，现在有了许多成果，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将被冲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反右中的资料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1949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忽略此点，由于时间的推移，将使后人难以分辨这些文字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和反右时，常常简单地依靠已公开的文字资料，并以此为据推断许多事件，这些研究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觉得很隔膜。比如在50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胡

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澍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页）范文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说到周扬。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但了解50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

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上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谨慎态度的。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年，“香港陈某寄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他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退还。”（该书170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

比陈寅恪还年长的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版）陈寅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50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解5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1950年6月1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是题“五四”。

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

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土改，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榘诸先生默默无语。（《日记》第6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惧的。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年7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1950年5月4日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罗常培亦非常热心”的判断是准确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榘默默无语”，也是真实的。特别是周炳琳表现得很有个性。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的批语中写道：

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其中所谓“对周炳琳的作法”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于“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诒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5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不肯洗脑”，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说：

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Martyr）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17册）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年下半年，他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2293页）给胡写信的林诒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1948年3月18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年代末许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能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353页）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

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 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 学：张元济 陈 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 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年在东京时我曾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

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6000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这则不实的信息，引起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命运。出席时事晚会的4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年11月，在纪念西

南联大校庆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 50 周年纪念集》105 页，1988 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 1900 年出生于上海，1919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潘大逵 1902 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 清华学校毕业，1929 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 1910 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 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两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 10 岁，而潘大逵则长费孝通 8 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们和胡适的关系。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灵魂。1940 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 moral（风纪）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494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 10 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绶，一个就是钱端升。张忠绶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

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 900 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绌《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26 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意志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509 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 年钱端升赴美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51 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 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2 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

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一二·一”之前的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 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页）40年代晚期，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1957年钱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255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当60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10册3844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11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现代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作为一个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1988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页，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年费孝通赴美时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24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35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举出的例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通交给当时《观察》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未收胡适致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卷第4期第13页，观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

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胡适的敬重。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年9月10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32—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1950年8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显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40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从50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

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年费孝通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与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年潘大逵也成了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

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40年代末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而将当时讲演的四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国40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四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三个全都没过1957年这一关，而这三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40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三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60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

第四辑

谁在思考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小职员。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些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辩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辩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当时是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谈不可

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怀旧

1995年11月底，我为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曾去昆明一次，当时恰好许多西南联大校友回昆明，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和西南联大校庆，我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交谈，听他们回忆和遐想，几乎每日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这些联大的学生那么容易怀旧，容易被往事牵走……后来我整理资料，看许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好像能理解一点他们的情绪，因为那些岁月中毕竟有美好的东西。他们都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他们怀念的也仅是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

人老了是容易怀旧的，但所能忆起的，多数是温馨的往事，不是一切过去都可以成为回忆的，就说那些联大学生，为什么不怀念50年代60年代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

我这几日正读张冠生先生的一本书，名为《乡土足音》，这本书是写费孝通的。费孝通晚年，特别怀旧，我过去读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强烈，这次读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

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谛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我们要活泼精神，守秩序，相敬相亲。我们读书要认真，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常常怀旧。

钱锺书与西南联大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锺书 1937 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 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锺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锺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 9 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 11 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 18 期 193 页）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锺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锺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

问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只待了半年就离开了。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锺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学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锺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

关于钱锺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锺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待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锺书传稿》）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锺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使钱锺书十分惭愧。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贻琦写信时，钱锺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中提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可见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抄了吴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锺书‘人才难得’。1939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锺书的 *Contemporary Novel Renaissance Literature* 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锺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年11月4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锺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果说钱锺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书。

钱锺书在联大教书不到 30 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待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此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反认故乡是他乡

这一两年的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稍有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口吻，思维的路向，不是将他乡认为故乡，而是倒过来，反认故乡是他乡。

稍有历史感的人知道，今天读书人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和过去不同，这个过去，恐不是 10 年，20 年，而是更早些。那时的读书人，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除少数另有图谋的人外，多数读书人是从当下自己的处境出发说话的，无论说出的话是左还是右，几十年之后，人们再听到，还是以为那是真话。比如，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这个人就很有意思，1948 年，他在上海储安平《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民盟开除了，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他过去是清华的教授，是朱德、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两句话，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的，说他们现在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而他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话的，不管当时战与和对谁有利，他觉得打下去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所以他呼吁和平。这大体是旧读书人说话的基本态度。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许多人说话的态度就很让人奇怪，他们说出来的问题，细细想来，多数是假问题，他们津津乐道，其实是忘了自己说话的处境，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的。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那些主张人文精神的念书人很尴尬，而使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人如鱼得水。市场经济曾经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呼喊而来的，现在他们又大叫狼来了。说这话的人，也是念书人。我就想问一句，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喊来的，就算这个已经到来的市场经济有他们的功劳，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说人文知识分子眼红王朔们手里的那俩钱，未免太看轻中国的读书人了，现在王朔们是先富起来了，但如果把问题放在谁的年收入高之类的水平上，念书人还有什么话说？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想要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大家的。念书人的这点理想，简单说，就是如下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工厂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话，前提是这个工人有权利自己办工厂（如果他愿意和有足够的能力），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或者对王朔们来说，这个权利已经到手了，但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他晚年作了《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第7册是关于现代哲学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三松堂全集》。这一册排在第12卷，但以后的都出了，这卷却没出，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不是要钱，而是要他们的理想。忘记了这个，就太错怪今日的念书人了。

最近又有人写文章，阐述什么是文明，提醒人们：西方文明救不了东方文明。这个问题很大，但现在说这样的问题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我要问，谁主张过西方文明可以救东方文明？其次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奢谈什么文明无所优劣的高论，真有一种不帮自家兄弟说话的味道。这也是典型的反认故乡是他乡。

中国知识界，很有一些人自觉地将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一笔掠过。所以思考问题或是评价自己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所获取的成就时，总让人有反认故乡是他乡的感觉。

我们有一位作家，前两年写文章，说自己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少多少种外国文字。言语中显得非常得意，意思是自己的作品已获得国际声望，企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获奖的心情，情透纸背。这个作家是以反左为

自己的责任的，这很好。但他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成就上，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怪圈。

这实际是一个常识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写作的。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那么结论只有两个：一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扼杀文学的，二是所谓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一些自然科学家就能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与国际上同类学科对话，为什么到了一些作家那里，一方面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下受了多少苦难，而一方面又盲目地夸大自己的所谓文学成就呢？还有一个常识问题，也常为他们自己所忘记，那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被意识形态所允许变成铅字的，发出真正独立的声音，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

前苏联有两部小说，一部叫《你到底要什么》，一部叫《活下去，但要记住》，这两部小说我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书的两种不同译法，但我很喜欢这两个书名。我算不上什么念书人，但喜欢看，喜欢听。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你到底要什么。这在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是被误解的，被误解是因为有些话没有说明白，尽管大家心里是清楚的。

自欺欺人

今日文坛和学界的风气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改变还不能说彻底。什么风气呢？比如文人写文章，尤其是批评文章，总不大愿把被批评者的真名实姓写出来，这其实有违最起码的批评规则。有时是作者写了，编辑怕惹事，就改为某某，或干脆用×××代替，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学界和文坛难道就不能像过去文坛那样，有话直说，直呼其名吗？

许多读者读到这种地方，总感到很别扭。去年我在《黄河》杂志上编发过一篇《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是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的。收到文章后，我见其中就有多处×××，我本想为他标出来，但一想到作者既然这样，总有他的道理，就姑妄听之吧。但文章刊出后，不止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是何苦呢？想看这类文章的人，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说谁，不想看的，你就写出来他也不懂，害得我还得再三解释。今年2期《读书》上有王蒙一篇说丁玲的文章，其中也有多处某某，我不知这是王蒙原文，还是编辑的用心，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读书》的读者，哪个不知道一点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何苦用那个×××呢？更奇怪的是《王瑶文集》第7卷收录了王先生1955年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从错谈中汲取教训》，文中多处出现“胡风分子×××对我的书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想为王瑶先生避讳点什么，故意隐去了那个人的真名，但买《王瑶文集》的人，哪个不知道这里的×××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呢？

这样难道就能为王瑶先生遮盖点什么吗？王瑶先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文章避讳过，他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是一说一，是二说二。现在有许多编辑，不知从哪里来的警觉，结果尽干自欺欺人的事，这种多余的自律行为着实害人不浅。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 1948 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 9 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清一色，是打麻将的人追求的，但文坛毕竟不是牌局，我想所有耍笔杆子的人，是不愿看到清一色的局面的。

有论战是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需要定一点规矩，谁来定这个规矩呢？我看就是卷入论战，或者挑起笔仗的人自己。笔仗在抽象的意义上就是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没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论战的规则，现在已近似于社会公理，已成为文人的基本道德，缺了这个德，不按这个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好无话可说，就像流氓唾在绅士身上一样，绅士是不能和流氓论理的，就是论，当下输的肯定是绅士，但旁观者则是清楚的，因为和流氓论理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事，谁要遇上这样的事，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论战的规则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一是挑起笔仗的人，你写文章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随便造一个名字出来。因为论战是要有回声的，你不署真名，让回击你的人去和谁论理呢？你既然敢挑起笔战，按理说你不但怕对方回应，而且应该是期盼对方回应的，真理愈辩愈明嘛。你现在署一个假名字，又想攻击别人，但又不敢坦然走到论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年前，储安平办《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

是一个敢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到一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三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

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学者的道德

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4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6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有1/3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科学界，对端正学风，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

做，败坏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即取消这些人的高级职称，并公布所涉事件当事人的学术经历和真名实姓。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手软，那是中国学界的耻辱。发生此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

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竺可桢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

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54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分，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西行漫记》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到：“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第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同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金岳霖的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

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北大往事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忆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第122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有意味的百分比

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年共有55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知道的。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后来不久，又说有40余万人。1959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45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1980年共改正了54万余人，余下的5000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及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55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也认为：“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该书下册8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55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谁定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书，才感到这个55万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毛泽东是受传统文

化教育长大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对数字的喜欢。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该书3册，89页）

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

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千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的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页）

在“三反”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151页）。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

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页）。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同上23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57年3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为基数。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了堆”（同上153页）。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9—380页）。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500万人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500

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 380 页）。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 537 页）。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 500 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 500 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 55 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 339 页）。

电视与学术明星

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学者介入电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批评者以为这是学者的堕落，而有幸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以为这是他们介入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明星的称呼，也很不以为然。

现代社会，电视是首选媒体，尤其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差不多可以说是获取信息、娱乐及思想的唯一渠道。按理说，学者选择这样的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并影响大众的观念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人们对学者的表现看不上眼呢？称他们是学术明星，这还是客气的，我在私下里听到的还有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说法。不管这话中听不中听，我们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情绪化的反映，从中来反思一下学者自身的表现吧。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者要不要介入电视，而在于怎样介入电视。如果平心静气地听听人们对学术明星的批评，虽然有过激之处，但就这种情绪所代表的思想倾向来说，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尽管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学者的鄙视性称呼。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学者应该比大众明白，但实际上那些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

谈起问题来，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学术明星呢？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护的学术明星，我以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学者们一般都知道，索尔仁尼琴那篇著名的《不要在谎言中生活》，他在那篇文章中表达的思想 and 做人态度，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不然我们就糊涂得不可救药了。

学术明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台湾杭之先生在《一苇集》中就有长文分析这种现象，可惜许多学术明星忘记了他的告诫，自觉扮演这种角色。只要有好处在，这种角色也就不会绝迹。杭之就说过：“只要有政治的存在，或至少开放、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还没有健全地建立起来，这种为了政治之需要而制造出来之凡是的、歌德的学术，文化明星便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喜欢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但他们要随时耐得住性子听老百姓的批评，你做都做了，难道还不让人家说吗？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因为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多的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顾准。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才能逐步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

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

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

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像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

顾准1959年写于河南商城的那些日记，可以说是他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智慧的结晶，顾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超前了后人二十多年。顾准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敬重，除了他的人格力量以外，与他在理论上的深度是分不开的。40年前，顾准的思索，今天读来，还让人怦然心动。他说：

从这里，不仅证明了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

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做献身精神的原动力。

应该承认，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人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在中小点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

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

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中国又是一种，而中国较之斯大林为尤左。其实原因也简单，因为集体农庄在苏联已足以解决商品粮食问题，在中国，若不“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商品粮并无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人口与土地问题。难道社会主义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以上这些话是一个知识分子 40 年前发出的声音，虽然当时不为人所知，但它说明，在那样禁锢的年代里，还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念，使中国当代思想史不再成为空白，仅此，顾准就足以让当代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思想家的气质，顾准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超越了时代文化禁锢和物质贫困的局限，执著地将眼光投向世界，更在于他始终怀有对底层贫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读《顾准日记》的时候，我总想到离开他的日记，去看一看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是怎样感受现实生活的，我想到了《竺可桢日记》。1956 年，顾准曾和竺可桢在科学院综合委员会工作，竺可桢是早顾准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后来好像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我比较了 1959 年 12 月 31 日竺可桢和顾准同一天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是这样的，当天竺可桢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宴请苏联专家的晚宴。日记这样写道：“膳后已 8 点半。院预备了游艺节目，有民族歌舞与独唱，钱学森夫人蒋英也唱了两支曲，与游艺并同时进行跳舞。……直到 12 点。进至 1960 年元旦时，郭院长已和陈副总理至人大会场，由张副院长祝大家新年快乐后，又进行了一小时的跳舞，一点始回。”接下来竺可桢真实地记录了大跃进以后的情况，他说：“酿成阳历年市上买不到蔬菜、肉、蛋的现象。”就在这同一天，顾准当年的朋友和同事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苏联专家晚宴、游艺、跳舞的时候，远在河南商城劳改的顾准在日记中写道：“长竹园的人们，下午三时左右回来，我虽然吃了 10 两午饭，还是随着吃了一顿。……八时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朋友们歌舞欢唱的时候，处在饥饿之中的顾准在想什么呢？请看下面这样的文字：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播，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

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

就算是花岗石脑袋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孩子们长大。

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实的努力方向。

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大去教书去。

现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我无意责备顾准受难时那些处境尚好的知识分子，但面对顾准留下的思考，他的形象无疑显得高大。别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而顾准这样的很少很少，因而我们的思想遗产也就不够丰厚，所以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格外珍惜顾准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因为这些东西——用顾准的话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日记》就是这样用生命写出的，这样的书是永远有生命力的。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一、教育转型

西南联大建立之时，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 10 年之际。联大的建立带有突发性，因为抗战开始，为使中国大学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她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前后共计 9 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术界公认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三所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对于我们评价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很有启发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以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而这开端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 20 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20 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事例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 20 世纪初叶时，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

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退庵汇稿》第345—347页，193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20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联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

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

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以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

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都知道大学教授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

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三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

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20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日记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

二

鲁迅生于1881年，郁达夫生于1896年，晚鲁迅15年。两人同为浙江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终生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75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由于父亲为中医误治而

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76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的特质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愈来愈贫穷了。（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年第6期）

三

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1912年到他逝世，25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账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

是两种日记的最大区别。鲁迅日记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

四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1933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打牌、抽大烟、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倒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

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1921年刊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1937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发表的日记就有20多万字。《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1932年杭州客居生活，《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记述1934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抒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少年无法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倾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讳，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

忏悔，不断下决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

五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价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54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

变后，以鲁迅日记中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

1919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晴。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九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

1925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同上，第548页）

1926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
夜鲁彦来。得秋芳信。（同上，第592页）

1927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651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894页）

1935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小川正夫信并赠《卜トイ工夕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见《鲁迅全集》第15卷258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

内许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

实，然而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 50 年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

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附录，第143页，1947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西南联大前身为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9页，1983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西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

惋惜，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第289—313页，199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朱自清 罗常培 罗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力 浦江清 唐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苏 黄国聪
 潘家洵 吴宓 陈铨 吴达元 钱锺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德 黄炯华 胡毅

历史学系：刘崇铉 雷海宗 姚从吾 毛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福 吴晗

哲学心理学系：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麟 郑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升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经济学系：陈岱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 瓚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枬 杨西孟 戴世光 萧 遽
 周章绂

法律学系：燕树棠 戴修瓚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 青 芮 沐 马质夫 章 剑

商学系：丁 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岱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章绂

社会学系：陈 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讲师）

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 30 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 1900 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锺书、费孝通、吴晗等 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锺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 50 岁、40 岁、30 岁。这个年龄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锺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锺书“人才难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陞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年1月29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

这封短筒，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几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4月，梅贻琦在朱自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

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快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教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

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1945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人的工具。”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

我想简单通过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坚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持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但后来丢失了。贺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当年他和冯友兰都曾被蒋介石请去给中央政治学校的干部讲过课，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说过迎合蒋氏的话，但贺麟本人对西南联大的传统还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1941年他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的这一番话，讲得真好。但后来贺麟也放弃了他的学术尊严，说了许多违心话。一种学术传统，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國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北京，1990年6月19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说、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

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国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进编》〔三〕上，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1期，第9页，

北京，1882年4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日，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

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已存在了近40年时间，这期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2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15年，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南开大学从1904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6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任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

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 15 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 1909 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锺书为代表）。20 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 50 岁左右，更有像钱锺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 30 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 1909—1929 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 年梅贻琦，1910 年胡适、赵元任，1914 年金岳霖，1915 年袁复礼，1916 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 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 年刘崇铨、叶企孙，1919 年钱端升，1920 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 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 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 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 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 年柳无忌、丁佶，1928 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 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 636—646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 1911、1912、1913 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见下表：

西南联大教授一览表

	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历史学系	哲学心理学系	
文学院	朱自清 罗常培 罗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力 浦江清 唐兰 游国恩	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苏 黄国聪 潘家洵 吴宓 陈铨 吴达元 钱锺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德 黄炯华 胡毅	刘崇 雷海宗 姚从吾 毛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达 张荫麟 蔡维藩 噶邦福 吴晗	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麟 郑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康 敦福堂 熊十力 (熊为专任讲师)	
	算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生物学系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理学院	江泽涵 申又枨 程毓淮 曾远荣 陈省身 华罗庚 张希陆 许宝騄 杨武之 郑之蕃 赵访熊 姜立夫 刘晋年 蒋硕民	饶毓泰 朱物华 周培源 越忠尧 任之恭 郑华炽 孟昭英 霍秉权 吴大猷 吴有训 叶企孙 王竹溪 张文裕 马仕俊	杨石先 曾昭抡 孙承谔 高崇熙 黄子卿 邱崇彦 张大煜 张青蓬 张子高 刘云浦 钱思亮 朱汝华	李继侗 张景钺 赵以炳 杜增瑞 沈嘉瑞 殷宏章 陈桢 吴蕴珍 彭光钦 吴素萱 沈同	孙云铸 王烈 谭惕畴 冯景兰 袁复礼 张印堂 洪绂 张席禔 李宪之 赵九章 王恒生 米士 鲍觉民 钟道铭 陶绍渊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	经济学系	法律学系	商学系	社会学系
	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升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陈岱孙 赵乃抻 周作仁 秦瓚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枬 杨西孟 戴世光 萧蓬 周覃绂	燕树棠 戴修瓚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青 芮沐 马质夫 章剑	丁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岱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陈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 (讲)

(续表)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航空工程学系
工学院	蔡方荫 施嘉炆	李辑祥 庄前鼎	赵友民 章名涛	张子高 高长庚 谢明山	庄前鼎 王德荣 李锦安 宁 晃 丁履德
	王裕光 吴柳生	孟广楫 周承佑	张友熙 毛起来		
	王龙甫 陈永龄	刘仙洲 徐叔渔	张镇俊 朱兰成		
	阎振兴 陶葆楷	殷祖澜 殷文友	范崇武 倪俊		
	张泽熙 李谟焯	江一彪 王师羲	顾毓琇 任之恭		
	衣复得 夏震寰	曾师岳 刘德慕	叶楷 范绪筠		
	李庆海		马大猷		

来源：《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第289—313页。

说明：本表系据该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编制，原名录中含师范学院，由于所任教授多为兼职，故未列；另外联大1939年度恢复了研究部、所，资料不全未列，电讯专修科、师范专修科的教授也未列。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锺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锺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锺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

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

“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同上,第225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4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第6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

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能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观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徙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转引自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9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1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自由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

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本特征，只有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一起，1949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总是能将摩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陶。”（《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31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最有亲切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第66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

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1949年以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年后开始衰落。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话题。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1952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的意识形态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道：“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

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3卷第19期，第8页）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做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年第1期，第163页）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了，但在1980年以后，朱光潜率先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379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逃出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第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56—161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74—75页，三联书店，1993年10月）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前者的明显用意有否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味，因为陶是留美的学生。而后再将矛头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

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吸入盟，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这样到了1957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毛泽东曾说过：“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

当明引不当暗袭

我在厦大给硕士研究生讲了三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三届学生，前后听过我课的约有近百人，我每次上课都要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我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最后一章中，专门强调了学术规则的重要性。我一般会引述三个材料：

一、陈澧《东塾续集》中的名言：

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典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笃实之道矣。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

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总结清代正统学术特色时概括出的十点规则：

1.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2. 证据选择，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5.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 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三、郅元宝等人翻译的美国查尔斯·李普森在《诚实做学问——从大到教授》一书中提出的三个诚实原则：

1. 当你声称自己做了某项工作时，你确实是做了。

2. 当你依赖了别人的工作，你要引注它。你用他们的话时，一定要公开而精确地加以引注，引用的时候，也必须公开而精确。

3. 当你要介绍研究资料时，你应该公开而真实地介绍它们。无论是对于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文献，还是别的学者的著作，都应该如此。

我个人认为，这些规则是中西学术的基本传统，可谓古已有之。近来有部分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没有和今天一样的学术规范，我以为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我1985年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批评家》杂志当编辑（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从事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多数都是这家杂志当时的作者），我到编辑部工作后，前辈总是要先告诉我们，选择和判断来稿时，一定要注意论文中是不是有抄袭行为，至于注释的规则问题，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有不同的格式和习惯，但在“剿说认为大不德”这一点上，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含糊过。

陈寅恪谈学术规范

偶然在杨奎松的新浪微博上看到一则涉及汪晖早年学术品德的材料，杨奎松说：“昨天还听说汪十多年前在港参加那边的读书会就把会上讨论的观点剽窃发表，惹起过不满。如这些属实，就太恶劣了。”

这两天恰好在读卞僧慧新书《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本书附录中有《“隋唐史”开课笔记》一篇，系陈寅恪1936年9月在清华的讲课笔记，其中有一段涉及学术规则。陈寅恪说：“演讲中凡引及旁人的意见，俱加声明。未加声明的就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此类意见听课的不能代为发表。这在外国大学本是通例，不必说。在国内有人还不大清楚，所以特为指出，希望大家注意遵守。”

一般来说，教员在专业性的讲课中，总是会把自己最得意的研究心得讲出来，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学者也乐于发表新见，有时候这些见解还没有形成文字，但在学术界有自然形成的规则，就是对于这些学者在讲述中谈出的学术观点，也同样具有知识产权，如果采用，当先讲出这些学术观点的原创者，不然就类似于抄袭了。从杨奎松微博中引述的材料判断，汪晖本人在学术道德方面，确实不顾及名检。这些年我们断断续续从一些记述陈寅恪早年讲课的笔记中，感受到了中国现代学术规则的形成和建立问题，它提醒人们，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基本学术规则，从来都是存在的，也为学者共同遵守。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学术著作，绝对不能以当时没有强调学术规则而得到豁免，事实上，当时只要是正派教员教出的学生或者规

矩的学生，一般不会做抄袭这样的事。古文字学家张颌先生说过“开多大的店，就要操多大的心”，汪晖本是一个普通学者，却硬要无边扩大自己的学术范围，他那些离开本业的学术研究，明眼人早就看出其不是出自自己的独立思考，因为这个年纪成长起来的学者，本来就先天不足，如果对此不清醒，很难不犯抄袭错误。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最近因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学界人士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既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他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只需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我们牢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学术批评要与人为善

这些年学术批评开展的应该说不错，特别是杨玉圣的学术批评网，以一人之力，担当中国学术批评的重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其他一些学术批评网，也时有公正的声音，这些都是应当鼓励的。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批评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可以理解。我个人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对于学术批评，有一些个人的浅见，我比较重视在学术批评中的与人为善原则。

与人为善，不是没有原则。我以为在学术批评中，对于明显的抄袭和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严厉一点是应当的，但与人为善的原则还是要提倡。我们现在有些学术批评，没有把与人为善当成第一原则，所以在学术批评中，表现出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方。从事学术研究，不可能不出现错误，但什么类型的错误，我们做学术批评的人一定要清楚。比如有人在学术论文中出了常识性的错误，把人名、地名或者某一句诗记错了等等，这些错误，我以为指出即可。没有人敢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从不出现类似的失误。但我们现在有些学术批评，不看学者研究的基本水平和长期在学术界的努力，而是抓住一个错误，随意挖苦，这些我以为都不足取。现在有些搞学术批评的人，在与人为善这一点上，似乎不够自觉。

批评一个学者，我以为一定要看他们长期的学术努力，如果是努力的学者，对于他们的错误，要及时指出，而不是以他们记错了一个人名或者把一句名诗记错了作者，甚至一点小的语法失误，而轻易怀疑他们的学术

水平。在这方面，保持与人为善的心态非常重要。还有一些学者，本来人家从来不以外文水平自夸，偶然在这方面出现一点失误，批评者也要正确对待。不要以一点失误，就怀疑学者的学术准备，甚至怀疑学者的人格。

说到学术批评中的人格问题，我以为还是要提倡胡适过去说过的话：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在学术批评中，我也认为失误可以随时指出，但不能因为小的失误就说人家的学术水平如何，这些都不是与人为善的做法。在学术批评中，我以为对于学者的失误，应当直接指出，最好是以更正的方式，最好不要用杂文的方式，更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对别人的短处，所谓知人论世，在学术批评中，我以为主要是要顾及学者长期的学术努力，而不是一时一处的失误。

学术批评中的与人为善原则，还可以表述为不以发现人家的错误为快乐。现在有些从事学术批评的人，也包括一些普通读者，可能在这方面还不自觉。比如有些读者自己有某一方面的偏好，也有积累，而这恰好是某一学者的短处。一时被看到了，就随意怀疑学者的基本专业水平，或者恰好读者正留心某一方面的材料，很容易看出学者的失误等等。这些做法，其实都应当改进，我觉得用“说明和更正”的办法比较好，这些常识性的失误，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多数是笔误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有些与学者关系并不直接，就是直接错在学者本身，用杂文或者网络语言嘲笑，都不是与人为善的行为。学术批评中的与人为善原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最好不要把平时学者的立场和为人搅在一起。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大问题就是大问题，不能以小为大，以外在因素干扰学术批评。

知青的最后辉煌

2010年4月13日，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行了“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颁奖典礼。国内媒体似乎没有对此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我印象中《南方周末》只是在二十多天后才以广告形式刊出了一张参加者的合影，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题目：《知行天下，岁月如歌》。当天揭晓的“2009年度十大精英”名单是：宗庆后、秦晖、马原、姜昆、马蔚华、吴思、徐纯中、马未都、陈丹青、刘永好，“特别致敬奖”授予了樊建川。

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活动，从所选择的人物身份可以发现，大体代表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特征，一是知青，二是平民。如果说代表性，这个选择出的名单，以知青为主，这也非常自然，在如今这个年龄段中，如果没有知青身份，而要在中国社会中有所成就也很不容易。这个选择有思想史意义，也有社会学意义。就社会影响来说，这个名单的代表性相当强，它是一个偏重思想文化的选择，比如秦晖、吴思以学者身份当选，他们的学术影响了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想。秦晖和吴思虽有公职，但基本是体制的边缘人物，并不受体制的青睐。马原、马未都、姜昆、陈丹青、徐纯中在文学艺术界中也有大影响，其他如宗庆后、刘永好、马蔚华就是企业家了，而这几位企业家中，似乎也只有招商银行的马蔚华有一点公家的色彩。

从自然年龄，常常可以判断社会成员的基本素养和思想，成才与时代条件相合是基本常态，也就是说，好社会成才容易，坏社会成才难，社会

的好坏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或者可以见仁见智，不过能保证个人的一般自由是基本条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我们从19世纪末算起，每隔十年左右计为一个时段，可以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人才出现的曲线是下降的，如果以1881年鲁迅出生算起，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后即开始下降，简单说，就是1930年后出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难在他们所选择的专业领域做出大的贡献，因为时代不再提供适于他们生长的条件，当然这是以中国内地为限。就以1930年出生为界，他们在1949年是高中年龄，以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是思想改造后的大学，思想高度统一的大学。近来流行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1949年后的六十年间，中国没有多出现创新人才，其实也恰好与这个自然年龄的曲线相合，说简单了，就是1930年后出生的人中间不再出现伟大的人物。原因就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没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基本条件。这个曲线我个人以为到1970年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才开始发生改变，但这也主要取决于这个时代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成员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自由条件。

在“2009年度十大精英”名单中，年龄最大，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和年龄最小，1957年出生的吴思，基本都在“中国内地1930年曲线”的最坏点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确实相当不易。

一个基本事实是这十大精英在如此恶劣的成长环境中尚能成就一番事业，说明他们的天资和禀赋相当优秀，个人勤奋也异常突出。但我们也要注意，这十大精英中以文学艺术和企业家为主，没有科学家，甚至没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这个特点说明了他们成长阶段的教育有严重缺陷，事实上这十大精英中，基本不具备完整学历倒是一个明显现象，多为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和企业活动，多数依赖阅历、机遇和先天的禀赋，系统训练显得不那么绝对重要，而科学活动却与系统和完整的训练更密切相关，这也自然造成了知青一代中，文学艺术、人文学术人才多而科学家少或者无的现象。知青一代，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一代，这不是他们个人原因造成的，是时代的选择，时代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个人前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现在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核心动力是缓

解将要到来的就业压力，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解决常态社会中将要出现的就业压力是集权体制自然的选择。按常理说，青年到实践中锻炼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选择，其实是最大的误人子弟。把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学生放到乡村去，这一行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公民受教育的权利，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当保障外，还应当有自由选择更高教育的权利。另外我们观察这一时段的历史时还还要注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基本与中国大学停办是重合的，大学是常态社会吸纳青年的一个主要场所，而大学停办期间（1966—1977年）的青年出路，必然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虽然1973年后，大学恢复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在数量上非常有限，根本消化不了适龄的青年学生，选择把他们放到农村去，其实是一个国家最愚蠢的决策，也是对国家民族前途最不负责任的选择。

知青运动中一个比较令社会成员感觉还公正的地方，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也参与了这一运动，虽然在事实上高干子弟无论在中国何处都有可能获得远比其他社会成员多的有利条件，但这一运动本身毕竟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为他们后来从政时对社会保持关切还具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当这些红色贵族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成员时，知青生活的经历有可能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发挥正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度十大精英评选中，我个人以为还应当再加进来一个官员的比例，因为在事实上，现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知青比例很高，比如习近平、李克强等，都曾有过知青经历，这个经历如何影响他们的从政生涯，当然非常复杂，但知青中的政治精英有可能迎来他们的辉煌时代，而在一般的社会行业中，知青已经基本退场了。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

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

1. 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2. 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他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3. 公民了解的历史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国家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特别是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4. 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国家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5. 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发自内心，政府不能用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历史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6. 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7. 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8. 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历史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前提。

历史教员的责任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

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

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

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连信息开放是判断历史的前提这样的意识都还没有建立，那我们如何判断历史？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一个人连自己生活时代与世界文明间的距离还不清楚，就来判断历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批评总统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观察真实历史的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学术的变化不仅仅是学术自身的发展，它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太没有生气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说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能客观地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

我个人在90年代的研究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重新了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选择的角度是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我所用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简单的实证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有传统的，我决不从理论上找原因，更不做主观的推演，而是要找出具体的事例，让这些事例来证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我以为是有的，远的不说了，比如严复那一代人的情况，因为隔得远一些，说起来也比较费事，我们就说近一点的，从胡适他们那一班人说起。

我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什么是自由主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我们有许多现成的专家，也有不少现成的专著。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我也

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等等。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按它的规则来为人处事，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点。现在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就说它不好，或者认为它是虚伪的，不现实的。这不对，我还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为人处世原则。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事例中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吧！

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50年代，胡适在台湾对冯友兰是有看法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并不是不知道郭沫若在政治上的选择，但他在自己的书中却对郭沫若做了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他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先生还认为，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继承他的“是郭沫若先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55人，经过五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人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主郭沫若当选的就是傅斯年。由此可见他们那一班人的气质和风度。1949年，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给他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录，陈毅都说中央研究院有兼收并蓄的胸怀。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还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情况为例。

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马寅初也是 28 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 40 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了。在 40 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 1948 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

前几年，我看过一本《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张廷钰编），其中所收的文章都在 1948 年以前，都是在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些抨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李扬编，《中央研究院史》，143 页）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 55 人，最后有 28 人当选，是两个人中才选一个。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把人文组 55 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绶、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 55 人当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少，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他们和胡适、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们都没有当选。这次院士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很多，如张忠绶，他是胡适做

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这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

现在还是要多向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学习，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对待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应当丢失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胡适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这些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常的言谈中感觉到了胡适他们那一班人的学者风度，教育的结果应当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最能见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很多时候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那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还组织过一个名为“平社”的团体。平社不是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朋友定期聚会。《新月》在第2卷第1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如同别的刊物一样，在开始时本刊同人也曾有过一点小小的志愿，但提到志愿我们觉得难受。不说也罢，反正是病象，原委是疏说不清的。痉挛性的兴奋，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用的；

这是虚弱不是强健的表见。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已往的工作。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我们希望借此可以多结识几个同情的读者，借此我们也希冀惕厉我们几于性成的懒散。在本刊与未来的周刊或旬刊上，我们一致欢迎外稿。得到纯凭精神相感召的朋友是一个莫大的愉快。”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胡适他们编刊物总是要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从20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都是这个风格，如果不信，可以去看他们写的发刊辞或者编后记，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对事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30年代胡适在许多问题上和罗隆基都有分歧，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 he 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治家之大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君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

《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19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胡适是这样，到了储安平那一代人，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子。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他希望这本周刊能成为自由主义的刊物，他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

的”。（《客观》，第1期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他还告诉胡适：“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职，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晋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

说了这么多具体的事，无非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些瞎胡闹的人，他们确实是想做事的。其实说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张东荪在40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冶’，乃是一种态度，或

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第5卷第11期）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66页）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

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

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所长是吴其玉，其他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院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

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文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写，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写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

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印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既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

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借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一、理想决定现实

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

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

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上曾讲了四点：

1. 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 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 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 教育应该独立，其含义有三：①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③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真正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当时还请了郭沫若，但他没有去。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过当时蒋介石在名单中看到郭沫若时的态度。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

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唯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竺可桢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的做法，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时，多数决策符合文明主流。吴宓在他日记中，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何炳棣讲过一番话。吴宓发现，中国近世历史：1. 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 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 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2. 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在国家前途的考虑上富有远见，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吴宓在日记中说，他那时常和陈寅恪散步，陈寅恪认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浚耳。当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是为国家保存实力，并不是害怕与敌人作战，战前主张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问题的知识分子，比激烈主张简单抗战的人要更有勇气。

任鸿隽也在《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中告诫青年：“我记得‘民

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就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前途背景下设立的。

二、学术独立决定大学成败

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谓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清华 1925 年在原留美预备学校设大学部，1928 年正式组建清华大学，但只用了 10 年时间，到 1937 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从她的成功中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要变形。

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 1941 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1939 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

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对外在干扰是这样，对自己也是如此。蒋梦麟在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以后，当时没有立即辞去西南联大常委（相当北大校长）一职。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不久蒋梦麟还是辞去了联大常委一职。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表现大学独立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容忍风气决定大学气质

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在战时条件下临时合作，可以设想其难度。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陕西固城设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但不到半年就散伙了，虽然原因有多种，但确实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西南联大的成功，应当说是自由主义气质在现实中的体现。

我们读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以发现西南联大也不是没有矛盾，也有冲突的时候，但教授间比较有容忍的气度。钱穆曾提到当时有些教授对各院院长多由清华人担任有意见，想闹事，但当钱穆一讲“此乃何时”，大家就平静了。在危难中大学教授表现出的品质，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养成了健全的人格。比如三校校长间的合作，也相当不容易。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冶’，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

“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一所战时组建的临时大学，在几十年后还让人怀念，必有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大学的国际化，在教授的选择方面，必然包括建立面向全球的教授招聘制度。前一段丘成桐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引来了北大官方的回应，但北京大学对丘成桐教授批评的回应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大学的外聘教授，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国学生在外学成归来，固定服务于中国大学；一种是外籍教授长期受聘于中国大学。外籍教授长期受聘通常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唯一性，也就是丘教授指出的全职，二是稳定性，至少一年以上在受聘大学居住生活。

中国建立现代大学的时间不算很长，不管从何处算起，也在一百年之内，但现在研究中国大学史的人公认，中国现代大学是成功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包括它的国际性聘任教授制度的同时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步就是国际化的，老北大和老清华以及其他老大学，大体都是这样。

本国学生在外学成归国服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海归”，在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这是一个基本传统，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主要情感体现。中国现代历史上，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是基本信仰，无论公派还是自费，那个时代，凡在西方学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服务的比例相当高，这方面有专门的统计。中国现代大学基本是依靠这些人才得以延续它的生命的。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和道德上远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可比，他们从西方回来，基本都是举家归国，完全放弃国外的生活，

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上，很难找出脚踏两只船甚至多只船的例子，要么在外，要么回来。那个时候，没有人把“海归”认为是外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别人也没有过分强调他们的海外背景。

那个时代虽然有许多毛病，但基本是一个诚实的社会，是一个正派的社会。老北大也好，老清华也好，它的学术地位都是自然形成的，校方从来不自我吹嘘。老北大、清华各系都有外籍教授，数量不是很多，但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长年生活在中国，完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其中许多人甚至把生命都贡献给了中国。像北大地质系的葛利普，清华外文系的温德等等。

中国早年地质学的成绩，现在公认是世界一流的。早年中国地质界的学者，很少不怀念葛利普的，特别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杨钟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20年，丁文江通过魏迭雅（David White）的介绍，把葛利普请到中国来，一方面在地质调查所担任研究工作，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主讲地史学和古生物学。杨钟健说：“自他到中国后，地质界有显著的进步。关于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和十年来中国地质学会会务的发展，葛教授出力很多，也是有莫大的功勋的。”（杨钟健《自然论略》，184页）

20世纪初期，李提摩太来太原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和北大同时，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和他一起到太原的人当中还有一位瑞典人，他的中国名字叫新常富，在山西大学校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位化学教员，但对于培养地质方面的人才非常用力。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奇怪，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山西大学出来的，他们后来都成了院士如孙建初、王曰伦和王竹泉。

中国早期大学中的外籍教授，给他们的学生留下过深刻的印象。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时，学生曾出过一本名为《联大八年》的书，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外籍教授和本国教授完全一样。比如对温德的介绍是这样的：“温德先生，美籍，在清华任教已二十余年。在校担任‘英诗’‘现代诗’‘E. M. Forsler’三课。温德先生年逾六旬，而活泼仍如少年，讲解英诗时，或模仿尼姑，或假作魔鬼，‘唱作俱佳’，时常哄堂。温德先生能说中国话

读中国古籍，如庄子之类，尤好研究草木虫鱼，对音乐亦有了解。所以昆明美领事馆每星期日下午的唱片音乐会便由他作介绍。”

这本《联大八年》中对许多外籍教授的介绍都非常亲切，可以看得出，这些教授完全成为中国学生的老师。比如对历史系教授噶邦福的介绍：“噶邦福先生，历史系教授，讲古代史。他是从前帝俄时代的皇室贵族，现在也开始爱他的祖国了。有时候，同学常向别的教授探问政治意见，这位老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大学中的外籍教授，是做样子，还是真融入了中国的校园生活，只有那里生活着的教授和学生才明白，今天北大或者清华的学生笔下还会出现像温德、噶邦福、米士、白英等外籍教授的音容笑貌吗？大学中的外聘教授，“海归”也好，西人也好，要真正成为大学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几个统计数字来对付一下，我们要过诚实的生活，只有诚实社会才是正派的社会。

老北大、清华有长期生存下来的外籍教授，也有短期生活过的外籍教授，无论长短，那些生活都是生动的，感人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在20世纪30年代（1935—1936年）曾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以维纳当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华的邀请，而且在清华呆了两年多时间，这是中国大学的骄傲。维纳来清华，看似一件小事，但细想起来，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清华大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维纳来清华的直接联系人是当时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20世纪30年代初，李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与维纳建立了友谊，他诚恳地邀请维纳来清华访问。从清华对维纳的邀请，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清华教授的世界眼光，二是清华当时的学术环境，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在当年的清华，这两点都是具备了。维纳能来清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华在1928年改建为国立大学后，实力迅速增长，30年代初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李旭辉：《三十年代N·维纳访问清华大学函电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44页）李郁荣先生在给维纳的一封信中说：“清

华以工学院拥有的设备和装置而自豪。数学系的图书馆与 MIT 的一样完善。任博士（引者注：指任之恭，他是哈佛和 MIT 的毕业生）认为物理系的图书馆要比哈佛大学的更加完善一些。我相信，您会发现这些图书馆为研究工作准备了充分的资料。”

正是由于清华良好的学术环境，维纳回国后，又鼓动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教授冯·诺伊曼来清华访问。冯·诺伊曼夫妇对此很感兴趣，维纳还正式向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李郁荣和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做了推荐，可惜两个月后抗战爆发，冯·诺伊曼最后未能成行。20 世纪 20 年代初，蔡元培长北大的时候，也正式邀请过当时到日本讲学的爱因斯坦到北大来访问研究，虽然爱因斯坦最后没有来成，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大学的眼光和胸怀。

北大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她能以谦虚和开阔的胸怀来面对批评，引领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诚实的社会，一个正派的社会。今天北大在外聘教授方面，还能再讲出生动的故事吗？

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一、由唯“成分”到重知识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因为这一举措开启了“文革”后中国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刚性制度，特别是废止了以出身和成分约束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习惯，所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各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潘光旦、费孝通和何炳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相对较高。晚清新学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越。

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上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那时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以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大体说来，197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分”社会。以“出身”和“成分”限制社会成员正常流动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血统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著名论文《血统论》就是对这一社会机制的反抗。

中国的“出身”和“成分”在高考制度恢复前，对社会成员的流动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在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事实上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城乡户口壁垒的完成为界）。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分”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对政治精英而言更为明显。

“出身”和“成分”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连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角色，其中主要特点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后代愈不受“出身”影响。据说当时有规定，凡十三级以上干部，他们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亲）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就是说如果父亲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而他们的子女可以不延续原来的“成分”，而以父母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因为高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生于富有家庭，如果没有此规定，会影响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但高级干

部的人数毕竟有限，在他们以下的虽然有革命经历的人也很难享受这一特权，级别越往下，他们的后代越要延续他们父母原来的“出身”，所以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变革中，革命后代具有先天优势。中国社会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分”为社会成员流动的主要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40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

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分”，最终设计了一个以“出身”和“成分”决定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

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讲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分”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到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文件。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初中或师范里，人们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

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篱槿堂自叙》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二、由重政治到看知识

1966年后，中国大学停止招生。但严格地说，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高考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有“工农兵学员”制度出现，就是在现行的学历评价体系中，对“工农兵学员”也没有做完全的否定，通常是以“大专”学历看待。在“工农兵学员”中后来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人才，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大学制度”，它的主要缺点是非常明显的。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观察，中国十七年大学制度中的缺点，引起了高层的反感，主要是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应试教育的发展，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主要表现在他和侄女王海蓉的几次谈话中。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主要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完全否定不符合历史事实。“工农兵学员”的来源是推荐，推荐的主要标准是“政治表现”。推荐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保障，这两条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不能说“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在“工农兵学员”的构成中，有完全的“劳模”，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知青，更有当时处境稍好的干部子女。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文官制，也就没有制度化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因为重政治轻知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

道主要依靠：1. 参军。2. 劳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3. 领导的个人好恶（当时凡得到毛泽东认可的人都极快上升）。“劳模”、“参军”以及领导人的好恶，它的核心还是“出身”和“成分”。那个时期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它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制度变革，它的标志性意义体现在政治进步上。因为在没有文官制度的历史条件下，高考事实上承担的是教育和选拔的双重责任，由重政治到重知识的转变，它所要改变的其实是中国精英的基本构成方式，事实上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革命传统中依靠“出身”和“成分”上升的渠道，转向了以学历和知识为实现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后到来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浪潮中，精英构成的新模式完成了。

三、进步中的局限

恢复高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步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这一制度的转变只是实现了当时“回到十七年教育”的理想，它的进步意义并不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独特魅力，它在瞬间完成了回到“十七年教育”的格局，这也不免为中国后来高等教育的深度变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十七年高等教育”中保留了以高考制度为基本形式的选拔机制，但是“出身”和“成分”在学生的录取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政审”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这个影响并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军校和法律专业学生的录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制度形式下，“政审”的阴影还在飘荡，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恢复高考制度的正当性而回避，同样道理，依赖《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等方式获得转变机遇，也再现了制度公平中的知识不平等，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竞争中（至少文科有这种局限），可能也影响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养成。

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77 年级”时代已经到来，“77 级”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 级”，至少可以把“78、79 级”甚至“80 级”包括进来，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在获得相对公平竞争制度的同时，它们成长时代的知识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这一历史时代局限的时代也同时到来，当“77 年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角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这样发问：恢复高考制度中产生的时代精英，他们将引领时代之舟向何处航行？

张芝联译 《英国大学》

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英国文化丛书”，共计十二册，译者分别是章元善《英国合作运动》、杨绛《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任鸿隽《现代科学发明谈》、张芝联《英国大学》、傅雷《英国绘画》、邵洵美《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诗》、林超《英国土地及其利用》、李国鼎《英国工业》、全增嘏《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张骏祥《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电影》、蒋复璁《英国图书馆》、王承绪《英国教育》。

出版这套丛书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二战后向世界宣传英国文明的一个举措，由英国驻华使馆负责。为出这套丛书，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英国文化丛书委员会”，成员有朱经农、林超、钱锺书、萧乾，另外还有两个英国人。朱经农为丛书写有一篇总序，丛书译者均为一时之选。这套丛书，我过去在旧书摊零星见过，买过杨绛、张芝联那两本。对张芝联译的《英国大学》，印象尤深，虽是介绍性工作，但张芝联译笔典雅，是极好的散文。

《英国大学》是巴葛爵士（E·Barker）向世界介绍英国大学的一本小册子。张芝联译序一开始就提到，他译这本书，是钱锺书的美意，还在译文结束时说：“书中的拉丁诗句，得钱默存先生的指教，方能译出，特向钱先生致谢。”

这套丛书虽是有目的的文化推广，但选择书目和译者却是一件非常认真的学术工作，朱经农主其事，但具体工作是钱锺书做的。张芝联在上海光华教书时，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他在《从〈通鉴〉到人权研究》

一书中，回忆过一件事。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的密件，恰好落在他手中，说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要求查明具报。张芝联看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由张芝联接受译这本书，可以大体判断他们那一代人的大学观，钱锺书帮他选了这本书，钱锺书的大学观，也不言自明。钱锺书本是大学中人，但1952年后，他再也没有选择在大学里教书，虽然个人职业变动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似乎也可理解为钱锺书对1949年后中国大学的态度，他对这种机关保持了他一向的独立判断。

巴葛爵士在《英国大学》中，除了介绍英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外，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性。他一上来就说：“英国所有的大学有一个特点，这点十分重要，非马上说明不可。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它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现代的英国大学诚然须得国王颁发的宪章后方始正式成立，不过这只是法律上的形式而已；在本质上，所有英国的大学都是独立的机关，即私人组织的团体，行政和财政都是自理的，聘请教职员及学校生活都不受外力干预。固然它们也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第3页）

巴葛爵士注意到英国大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脱离政府而活动同时仍希望政府协助。真奇怪，也不合逻辑，但是就行得通。这就是为什么某一个作家说：英国大学是英国民族的创作，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创作。整个大英帝国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而且的确有人说过。大英帝国既不是政府的创作，也不是政府的行动所创立，而是自由团体和这团体的行动所创立的。”巴葛爵士认为：“英国大学根本上是自主的，它们既不受辖于中央政府的教育部，也不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牛津剑桥的行政，一向操在学校当局的手中，这些人都是餐于斯寝于斯的。其他大学则恒在双重的管辖之下，一方面是一个董事会，由校外人士及校方代表所组成，掌握校政的大端；另一方面是校务委员会，为教授及一部分教师所组成，管理纯

粹的学校教务。董事会往往惟校务委员会的意见是从。在任何大学中，学校施政的方针总为该校教员所左右，不论聘请教授或行政方面都是不受外力干预的。”（第11页）

巴葛爵士还在书中强调，英国各大学在行政上是自主的，财政的调度也不容外人干预。他说当时英国大学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已经过半，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绝不以控制大学行政为经济援助的条件”，而是将支配经费的权力全权委托给大学当局，“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极好”。

这些年我们从上到下都在讲现代大学制度，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价值，我们往往避而不谈。在上的人讲现代大学制度，以为政府给了钱，当然就要管大学的事，在下的人则以为吃了人家的就嘴短。殊不知在现代大学制度里，给钱而不干预才是它的关键。不合逻辑，但这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独特处，有钱就是老大，那与做买卖有何区别？需知办大学不是做买卖，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

张芝联、钱锺书、储安平他们青年时代有英国生活的经历，对英国大学制度的本质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现代大学制度已是常识，而当时中国大学虽有缺点，但在基本倾向上趋近现代大学制度，比如私立大学的法律地位始终得到保障，而今天所谓私立大学，只是徒有其名。

2012年4月15日于厦门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在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沁园春·雪》了。关于这首词的经历，将来很有必要写一篇“《沁园春·雪》传播小史”。我现在见到的史料，有周策纵关于这首词的来历以及胡乔木与这首词的一些传闻，如果努力，我想还可以找到更多史料。

我亲眼见过发表这首词的最早史料，是储安平当年在重庆主编的《客观》周刊，当时这本周刊的“副叶”是聂绀弩主编的。这首词发表后，当时知识分子有很多议论，有些知识分子从这首词中看出了作者的胸臆。我平时看书比较注意收集他们对这首词的看法。

多年前我写一篇关于《大公报》王芸生的文章，曾引过他当时给傅斯年的一封信。王芸生把《沁园春·雪》抄给傅斯年，抄完以后，王芸生写了这样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216页）。

前几天看《新文学史料》上方锡德先生整理的吴组缃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日记，吴组缃恰好也谈了读《沁园春》的感想，与王芸生的见识完全相同。这则史料虽是细节，但可以看出当年重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许多事物的敏感。吴组缃说：“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第34页）

吴组缃早岁出身清华，受过自由民主的教育。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年闻一多、金岳霖等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就是看到《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生了对蒋介石的反感。闻一多曾说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公开向“五四”挑战。“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许可以作为学术对象争论下去，但科学与民主精神确实对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种影响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是类似于宗教的一种情感。一切反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难引起共鸣。有时候对一首词的传播经历和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我的朋友胡文辉，去年把陈寅恪的全部诗都笺证出来，承他不弃，送我一部完整的打印稿。我在一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读完了。今年八月间，我在北京的“布衣书局”里乱翻书，偶然看到一册旧抄本。书店的老板告诉我，此稿本是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教授家里散出来的，个别部分已被虫蛀，但基本不影响阅读。书店的老板胡同先生也是旧识，他每天都写贩书日记，今年三月间的日记里提到过这个抄本，还特别提到其中抄了陈寅恪的诗。胡同的日记天天都在网上，看到的人当不在少数，据说文辉兄好像还问过他，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要下这个稿本。我想还是胡同没有说清楚，如果文辉兄看到原物，我想他一定不会犹豫。不过现在这个稿本到了我的手里和到了他的手里一样。

因为那天我在北京有些空闲时间，就在书店里把这个抄本细细看了一遍。在旧书店里选书，有时候不能说得太多，也不能显得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看到有用的东西，也不能激动。这个抄本里至少有三四个人的笔迹，其中有一个人的字，我认为特别好。胡同说这是广州罗孟韦家里出来的，我认为大体没有错，其中一个证据是稿本里还夹了一张手抄的陈寅恪的旧诗，稿纸用的是“广州市汉民北路李同记文具印务局发行”的旧稿纸，我看字迹有些像陈寅恪夫人的，但不敢确定。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知道是早年广州印务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稿纸所用年号还是“中华民国”。

这个抄本主要抄了六个人的诗。这六个人都与陈寅恪家或者与陈家及近代中国诗坛有关系。起首是归庄的《万古愁曲》，接着是“蝥庵”诗录。“蝥庵”是近代岭南名诗人曾习经的号，稿本主要抄录的是他的诗，极个别处有点评。然后是范伯子。范家与陈家有姻亲关系。第四个是柯劭忞，第五个是严复，有较多的评注。第六个就是陈寅恪。可见抄者的眼光极高，所抄录的近代名诗，与陈家的趣味非常密切。

一般地说，这个抄本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字写得很好，但可惜不是名家抄录。稿本里抄录的陈诗，我都曾见过。清华和三联的本子里都有，从这个意义上看，稿本的价值也很有限。我要下这个本子，主要与陈诗的标题问题相关。

陈诗生前并没有完整出版，后来的诗集是陈的家人根据陈夫人的抄本和朋友间的流传整理而成，所以陈诗标题并不统一，因为许多诗是从别人的年谱和日记里抄来的，所以常常有些差异，特别是有些诗题的改动，其实有丰富的时代内容。我认为这个稿本有些意义，就是因为它是陈诗早期的流传本，又因为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间的传抄本，所以更接近陈诗的原貌，特别是稿本中还有个别字的改动，与现在通行的陈诗略有不同，所以具有研究价值。

稿本第一首诗是《乙酉八日听人读水浒新传感赋》，通行的标题为《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

第二首《题双照楼集》，通行为《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关于这首诗，胡文辉的解释非常丰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这个稿本是陈诗原题，可证明文辉兄的许多判断。

第三首《感事》，通行为《癸未春日感赋时居桂林雁山别墅》。

第四首《南朝三十五年春在伦敦将回国》，通行为《南朝》。

第五首《伦敦病院中听读英文天桥小说其中述及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事忆壬寅岁与先生等东游日本遇李君于上海李君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自况也》。通行为《乙酉冬夜卧病伦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

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第六首《大西洋舟中记梦》，与通行标题同。

第七首《除夕北平》，通行标题为《丁亥除夕作》。

第八首《戊子三月十五日清华寓园海棠下作》，通行为《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阳历三月十九日作》。

第九首《感事》，通行为《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

第十首《答叶恭绰》，通行为《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问近状赋此答之》。

第十一首《人日》，通行为《庚寅人日》。

第十二首《有感》，通行为《经史》。

第十三首《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诗即用戊子春日原韵》，与通行标题同。

第十四首《庚寅广州七夕》，与通行标题同。

第十五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有作》，通行为《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第十六首《霜红龕集有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庚寅残冬一九五一一月》，通行为《霜红龕集有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

第十七首《中秋庚寅广州》，《庚寅广州中秋作》。

第十八首《题冼玉清琅馆修史图》，通行为《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本题共三首。通行本无第二首，本稿中有，删除原因是因为此诗对范文澜和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很不客气。张求会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此稿本有存真的意义。

第十九首《题吴三立诗》，清华版诗集中无而三联版诗集中有，且为两首，总题为《己丑除夕题吴辛旨诗》。胡文辉笺证稿中有此诗，可以对证诗的不同来源和出处。

第二十首《文章》，与通行标题同。

第二十一首《寄瞿兑之》，与通行标题同。

第二十二首《寄北》，与通行标题同。

第二十三首《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与通行标题同。

陈诗无疑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注意。陈诗跨越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它的意义相当丰富。陈诗的流传过程其中也包含了时代变革的因素，所以虽然是一般的抄本，但它的文献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几则读书札记

一、关于梅兰芳的一条史料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一个主要思路是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为此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面设有专门办公室。会议召开时，发过许多文件，其中一个《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列为会议专题报告之四。这个报告在陈述当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情况时，曾举了许多知名人士当时的收入情况加以说明并和他们过去的收入相比，几十年后再读这个报告，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因为这是依据基层汇报整理的政策性文件，所以有相当的真实性。

在这个指导性的文件中，提出了要给高级知识分子特定津贴并同时列出了各机关中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共有860人。这个名单大体可以认为是当时在中国各行各业中被政府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高级艺人。报告中说：“高级艺人目前亦可使用本办法。但过去有十五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五〇〇元以上，有的达到一千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再雯、叶盛兰、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陈伯华、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薛觉先、白驹荣。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第6页）

这个名单中没有梅兰芳，而是另外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一百六十三元，但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从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一五〇〇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一七〇〇元，谭每月一六〇〇元，裘一五〇〇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梅、周、程的待遇，文化部正拟方案中。”

从这个材料中，大体可以判断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高级艺人的待遇情况，也反映当时政府对他们收入的看法。

在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对作家收入的判断，而且我们从对作家收入的判断中，还可以推断出制订这个文件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思路。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无论何时，能负一点责任的人，在制订政策时，成心想把事情搞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不合人性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后来真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政策呢？我感觉多数还是因为知识结构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够。比如中国的具体工业和经济制度，多是由从东北出来的高级干部参预设制的，而他们其实对现代经济和工业制度基本不了解，但他们又在那个负责的位置上，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选择自由度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局限，但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眼界，确实具体的政策制订中会体现出来。比如在这个中央文件中，关于作家待遇的情况是这样设想的：

作家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办法文化部已经拟定。根据新的稿酬标准估算，作家的收入将比过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写小说七万字，印三万册，以每千字二十元计（新稿酬办法规定每千字一〇——三〇元），全年可得稿酬二三八〇元，平均每月约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较多的稿酬。如老舍，一九五〇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七九〇五元，平均每月六五九元。又如刘白羽，一九五一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四千字，按每千字二十五元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六五四五元，平均每月五四五元。因此，作家均未包括在此选择名单范围内。

因为这个规定中没有作家，所以后来统计时还再次强调说明：“这个名单内一般未列作家，因为他们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但文化部名单中还有沈雁冰、夏衍、阳翰笙、田汉、曹禺等同志，军事系统名单中还有宋之的同志，我们意见也以不列为宜。”（13页）

从制度设计者考虑，他们的想法很不错，对事实判断也还准确，认为作家应该主要靠稿酬生活，作家有了稿费，就不应当再要政府的津贴了。但从制定文件时的思路观察，他们又把作家的写作数量看成了一个恒定的情况，其实作家的写作数量是最不能平均看待的。关键是要把他们看成是国家干部还是自由职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是自由职业，政府何需津贴，如果是国家干部，则需一视同仁，把本来冲突的职业放在一起，还要尽可能保持平衡，想想也真不容易，自由职业，顾名思义，给他们自由就可以了。不给他们自由，又认为他们应该靠稿费生活，这就有点不公正了，对艺人也好，对作家也好，靠稿费生活的前提是他们有自由。

二、章乃器的一封信

2002年前后，我和丁东在章诒和先生家见过一次章立凡先生，此后我和章诒和先生来往较多，每年总要见几次。2004年，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学一年，章诒和先生凡张罗朋友聚会的饭局，常常想起我，让我十分感动。虽然和立凡先生此后没有再见的机会，但立凡先生的著述和文章，我却是每见必读，非常佩服。去年反右五十年，章诒和先生主编一本文集《五十年无祭而祭》，找了四五个朋友写文章，其中就有立凡先生《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一文。前一段我再读此文，发现有一则史料可能章立凡先生没有注意到。

历史有必然性，但偶然性常常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没有偶然性也就没有必然性。1957年反右中的大右派，决定他们命运的固然是他们平时的思想和人格，但在成为右派这个具体事件上，每个右派身上都有一个决定性的偶然因素，正是这个偶然因素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早期中国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都是有政治家气质的人，他们从政，确

是想做一番大事，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判断历史的基本走向上发生了一点偏差，当然这与早年国民党的一些做法相关，但他们最终的选择给历史留下的悬念还是很多，关于章乃器的命运，近些年立凡先生写了许多文章，大致提示了在时代风雨中，个人选择的一些基本事实。对章乃器个人来说，除了他一贯的思想、个性和行事风格外，我以为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中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命运，这封信刊在1957年《内部参考》第2164期第530至534页上，全文如下：

章乃器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四点意见

——章乃器给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您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中的讲话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应该让更多（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听到、读到。

我对您的讲话内容有四点意见，供参考：

1. 说评级是争名夺利。我知道，您是根据许德珩部长的反映而提出批评的。的确，高级知识分子的评级引起了不少问题。这是因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等级标准很难规定的具体，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比较复杂，不易应付；当然，在执行中也会有缺点。（我们在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方面，虽有很大改进，仍有很多缺点。）机关中的一般职员情况就好一些，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产业工人是参加评级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问题虽然也有，但比较少。这是因为，产业工人的等级标准容易规定的具体；而他们的性格又是朴实的。因此，我认为不能笼统地批评评级是争名夺利。因为，这是产业中按劳付酬的八级工资制的基础。这样笼统批评，对产业工人、工会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

2. 关于粮食的征购数字。1956—1957年度计划征购八百零二亿斤，是因灾减免的结果。原来的数字要大一些。今年（1956—57粮食年度）大致要挖库存五—七亿斤，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过去许多人认为少购可以少销，现在，多数地方的经验证明，少购并不能少销。因此，我建议，以提“在‘三定’的基础上稳定三至五年”为好。

3.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以为，这主要是名词概念的争执。如您所说的，是先进、落后的两面性质或者两重性，他们是不会不接受的。毕竟，康有为那样的人物，在今天是不会有。值得回溯的历史事实是，资本家们印象最深刻的两面性，是“五反”中提出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经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革命和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两面性。这是使他们听了要惊心动魄的。在努力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时候，笼统地提两面性显然是有害的。如能再说明：今天存在的两面性已经不是“五反”时期的两面性，那就更好。

过去许多人还坚持说：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两面性的阶级领导有两面性的阶级，或者是不需要改造的阶级领导需要改造的阶级，这也引起了思想上的问题。如您所说，就应该是政治上先进的阶级领导政治上落后的阶级，这在我想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说自己比工人阶级分子还要先进，从而用不着改造了。这种人即使有，一定也是极个别的，连“吹皱一池春水”都谈不到的。我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在1954年报告当地工商业会员百分之百违法的一个民建地方组织的代表人所反映的。这种人的反映有必要进行复查。

4. “死转化为生”，从生理状态说还不可能，从社会状态说则可能。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类的成语加以说明，请考虑。

匆促中提出以上意见，不对请指正！

致

最大的敬礼

章乃器

1957年3月 日

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是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这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的，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这个讲话，现在网上有依据文革时期流传出来的记录稿整理的电

子文本，非常容易得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记录稿和发表稿之间巨大的差异，虽然发表稿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但在整体判断上，记录稿和讲稿不是一个意思，简单说就是记录稿传达的信息是“放”，而发表稿传达的信息是“收”。从记录稿看，毛泽东讲得很随意，虽然经过详细准备，但杂乱无章，时有讲错的人名地名和事实，旁边不时有人插话更正，但从记录稿传达的会议气氛判断，会议比较轻松，因为笑声不断。傅雷后来对这次会议有一个评价，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到了“化境”，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录稿到发表稿变化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这期间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研究者都在分析，但没有第一手档案史料的开放，终究还是个谜一样的问题。

我想当时章乃器大概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有类似于傅雷那样的感觉，但他毕竟是政府阁员，对于实际工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本人又有现代知识，所以并不简单为讲话的气氛所迷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上面的信。

我没有详细对比记录稿和发表稿之间是不是吸收了章乃器的具体意见，但从把此信刊在《内部参考》这一事实判断，基本是作为一个反面材料。从章乃器信的口吻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虽然非常礼貌和谦虚，但基本是对部分讲话内容的批评。特别是信的最后几句：连“吹纶一池春水”都谈不到的。……“死转化为生”，从生理状态说还不可能，从社会状态说则可能。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类的成语加以说明，请考虑。

“吹纶一池春水”、“死转化为生”都是毛泽东讲话中他以为的神来之笔（从记录稿中的笑声判断），而章乃器现在却用了这样的口吻提出来，其后果也就可以想见了。那个时候虽然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从后来的事实判断，凡批评过毛泽东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比如梁漱溟、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章乃器这封信，大概就更使龙颜大怒了。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现在最感困难的就是档案不易得到，有时候很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担忧，生怕多年的研究和判断，将来忽然被一种解密的档案否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有时候会对自己的智力造成伤害，

所以我只想做一点收集史料的工作，在史料积累中呈现历史的真相。现在的学术工作，凡不以新史料支撑的研究，最终要给人启发和帮助就很难。学术工作，无论大小，要以有知识增量为追求，要么史料、要么思路、要么判断，总要给人启发方为有益，不然就是徒耗时间和精力。

三、有关陈寅恪的一条史料

中国当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将有与以往历史不同的难处，一是档案解密程度低，二是档案情况复杂。从理论上说，就是将来档案解密了，还有一个判断档案的问题。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强调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的观点，将成为一个判断史料的原则思路。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资料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但是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是非；但我在研究中也并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

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下面将要引述的是一个国家机关当年的秘密材料，来自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第140页。它所反映的问题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件相关。这个材料的撰写者是当时国家机关的新闻记者，他有在历史处境下自己的职业伦理，虽然多数人现在还健在，但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通常不会去追问这些撰稿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个职业规定外，他们具体叙述的历史，虽然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些史料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具体历史的细节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现场感受，这些是我们在正史材料中所感受不到的。

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

[广东分社七日电] 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普遍存在着“准备怎样搞，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这问题引起了该校教授们种种的思想顾虑。有些教授担心考据工作的要被否定。个别教授说：“否定了胡适，便否定了自己的一大半，谈何容易”。中文系部分学生向教务处和校刊室反映了一些教材中的错误观点，要求自下而上开展一个检查和批判运动后（学校方面未同意这样做），教授们更形不安。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成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中文系教授容庚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他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梁方仲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毕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蓝虽会批判人，但自己无底。”历史系主任说：我们系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胡适的课，关系不大。又说：胡适的观点已属过去，谈不上“大影响”，只能说是“残余”。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思、吴重翰

等把胡适的政治态度和治学观点割裂开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学方面却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时他们大骂俞平伯而捧胡适。容庚在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一面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枉费精力的废物”，这是他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的结果；一面却颂扬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学习的”。

有些坏分子从中破坏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曾有人寄了一封匿名信给中文系主任王起（民主同盟），叫他不要“盲目”跟共产党走，做共产党的“应声虫”，并且恫吓他说：“二十世纪是共产党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他们的。”王起接信后思想曾一度不安。（中大党组织已及时对他进行解释，勉励他仍积极地领导该系的讨论。）（潘国维）

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

四、李锐日记中的一条史料

1957年的反右运动如何起源，现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多数是依据后来史料做出的推测性分析，至于决定性因素，恐怕将来还是要依靠高层档案解密才能得到更有力的解释。不过有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持，那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或者说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已有不少史料和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信任的，至于这个观念如何在他身上持久发生作用，以后我们可以随着史料的发现慢慢深入理解，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与后来中国发生的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远因。

前些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2001年7期）上读过白嗣宏一

篇文章，大意是说，1947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 and 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个材料从后来的档案中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一生基本没有改变。前一段，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看到新出版的《李锐日记》（1—3卷，2008年，美国），非常有兴趣，就翻看了一部分，其中有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个谈话记录，由李锐记述在日记中。

李锐写到，1952年2月14日：“毛主席曾对黄讲，城市主要问题，本质是资级与无级斗争问题。（黄老认为是生产）。——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李锐日记》第2卷第324页）。

因为李锐日记用了缩写的形式，我理解“资级”就是“资产阶级”，“无级”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后一句“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我理解，这句话是说将来的“特务”主要出在“资级”当中，这个“特务”可以理解为是“坏人”的意思。如果这个理解符合毛泽东的本意，那么后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历史就可以说找到了远因，比如1951年张东荪的

“特务”问题，1952年的“《学习》杂志事件”以及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后来许多针对资产阶级运动的主要走向。从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观察，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五、1957年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两封信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1957年5月间，同为中国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黄炎培、陈叔通和陈铭枢共同来到了历史的关头，他们本都是忧国忧民的热心人物，面对一件今天看起来毫无悬念的历史事件，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很难说他们的个人选择存在投机心理，但最后的结果是陈铭枢成为右派，而黄炎培、陈叔通却躲过了这一劫。

事情起源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决定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陈铭枢赞成毛泽东的这个选择，而黄炎培、陈叔通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一个历史细节是黄炎培、陈叔通选择先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表示忧虑，主张慎重，而陈铭枢却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赞成毛泽东辞职，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历史非常简单，陈铭枢的信惹恼了毛泽东，而黄炎培、陈叔通的信，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曲折表达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余地。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

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可能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却没有收陈铭枢的信，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源来寻找陈铭枢致毛泽东信的内容。

1958年12月16日，民盟中央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曾传达了周恩来在12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内容完整保留在当时民盟中央内部出版的一份“阅后收回”的《中央工作通讯》（1958年第1号）上。我没有查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知是否收了这个讲话？我感觉不会收。

周恩来的讲话是要向民主党派解释，中央赞成毛泽东的选择，但同时又认为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是“恶意污蔑”，但却始终没有正面公开陈铭枢的原信。周恩来说：“正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头子陈铭枢于5月18日上毛主席书对主席进行恶意污蔑，造成主席辞职，说是可以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陈铭枢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主席辞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因此，在去年五、六、七月，忙于反右整风，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见，所以暂时只好不谈。”周恩来讲，从国内国际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毛泽东辞职的选择时机是成熟的，顾虑是可以解释的。但对黄、陈和陈铭枢二人的判断却是：“所以现在提起两封信，很有必要。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

暂时的。说到最后，主席的考虑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作了很好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内心是真想让毛泽东辞职，但还要讲出许多“中国离不开毛主席”的理由，还是黄、陈更了解毛泽东，而陈铭枢则以假为真了。

199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陈铭枢回忆录》，基本没有涉及他1949年后的经历，但他给毛泽东的信却成了历史的重要文献。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相当复杂，民主党派高层人物忧国忧民，凡顺应世界潮流的建议，一般总与政治斗争发生冲突，常常为人利用，在那种政治内争中，不可能再有什么是非，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这些细节中，传统政治讲权谋，现代政治讲诚信，陈铭枢用现代政治思维判断毛泽东的选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六、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人在心情最灰暗的时候，总要设法选择一些能平衡自己内心波澜的活动，在中国文人身上，当对现实极度失望时，人们总能发现他们会把原来的热情转移到了其他学术方面，比如鲁迅会抄古碑、收乡贤旧籍或者留意汉画像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1989年6月以后，李慎之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李慎之先生和钱锺书同为无锡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处共事，平时也有交往。在心情最灰暗的时候，想到做这样一件事，固然是对钱锺书先生学问的敬佩，但更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相关。当时钱锺书有一首名为《阅世》的旧体诗，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诵。二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记起当时朋友见面提到钱锺书这首诗的情景，真有往事历历在目之感：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李慎之先生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其心情当与这首诗的情绪相

通，所以做起这样看似枯燥的事，也就兴味无穷了。李慎之先生曾在《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曾收集过钱先生的译文，油印出来为学者示范”，就是现在这本《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我过去留意过这件东西，但一直没有见到，后来北京一位朋友得到了，知道我有此意，就痛快地送了我，我想从中判断李慎之先生当时做这件工作的心情。

《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是油印本，主要收集《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英文中译，其他外国文字翻译没有涉及。《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前面只留有李慎之先生一个简短的“编者前言”：

钱锺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据陈乐民先生《李慎之先生二三事》回忆，当时李先生还曾有把《谈艺录》《管锥编》中其他国家的文字，也汇辑出来的想法，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李先生也没有打算发表，只是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

1998年，当时《万象》杂志出版后，同时还编辑一本《万象译事》，可惜只出了一本卷上，《万象》虽挂名在辽宁教育社出版，但主其事者是北京沈昌文和上海陆灏。《万象译事》中就收有李慎之先生编的《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注明是一部分，只是关于《谈艺录》中的内容，只有原编的四分之一，因为《管锥编》的内容更丰富。《万象》登载这一部分时，显然经过了李慎之先生的同意，因为“编者前言”前言下特别注意了“李慎之，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般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史料中，对李慎之先生编辑的这个材料还不太注意，但如果我们理解钱锺书和李慎之当时的交往及当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判断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心情，这件学术工作中，寄托了李慎之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敬意，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因为这个材料并没有完整出版，从保留史料的角度看，应当找

机会把它完整印出来，这对以后钱锺书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七、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这就是文件。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 59 名，其中中央委员 40 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 11 名），候补中央委员 19 名”。这 59 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翹然、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

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销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 59 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 1957 年底共有 3378 人，占全体盟员的 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 40 人，占全体中委 140 人的 28.5%，其中副主席 2 人，中常委 11 人，占中常委总数 37 人的 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 30 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 100 人的 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 230 人的 32%。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 5% 的比例算，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

知识分子的抉择：· 离开的与留下的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它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胡适的直觉

一般喜欢文史的人，对于自己长期居住地的乡邦文献，多数都曾稍有措意。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近代以来的山西地方文献有所搜集，后来到了厦门，平时也会留意福建和厦门的地方史料，并在特殊的机会里偶然有点小收获。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有一个规则，就是越靠近人物和事件近处的材料，越真实越丰富。以地方志为代表的乡邦文献，成为中国保存史料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国人对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在太原曾搜集过冀贡泉的几种著作，多数是他早年在山西大学的法学讲义。冀贡泉在山西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但在外省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不过他有两个儿子却是大名鼎鼎，一个是冀朝鼎，一个是冀朝铸。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一度对邓小平访美时身边的翻译非常有兴趣，对此人的神秘性和英文之好，多有传闻，这个人就是出身山西汾阳，在太原上马街成长的冀朝铸。而这几年人们谈论较多的却是他的哥哥冀朝鼎。太原上马街离山西作家协会极近，步行不到十分钟，我还专门想去找找冀家早年的旧宅，但早已没有踪迹。

有时候走在这条并不宽敞的街上，会忽然闪过一点联想，这条街上走出的一个青年，曾经用他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陈立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单列一节，批评冀朝鼎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20世纪40年代末，专门给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出坏主意，导致当时政府信用崩溃，失去人心。这个判断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实到这种

程度，人们可见仁见智；历史是不是如此简单，冀朝鼎的作用是否有这样的威力，也大可以讨论，但冀朝鼎后来身份公开后，人们还是会有一点特殊的感想，他确实是只与周恩来单独联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冀朝鼎还是胡适的校友，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时也曾多有来往。胡适日记中有他们交往的痕迹。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有名，当年曾受到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在专业领域也是引用率极高的著作。冀朝鼎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曾受到过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魏特夫自己说过，他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原初灵感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冀朝鼎早年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和他的基本思想理路。

胡适 1936 年 7 月 18 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条记载：“读冀朝鼎的 *Key Economic Area in Chinese History*，太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胡适提到的就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本书想来是冀朝鼎专门送给胡适的。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主要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冀朝鼎思想方法可能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自然结果，而胡适的思想方法则让他不会对冀朝鼎的学术著作有好的印象和高的评价。至于冀朝鼎这本学术著作在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地位，自有专门研究者关心，但这个细节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对人生选择的关键作用。陈立夫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当时他就认为冀朝鼎是共产党，因为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冀朝鼎才得以安全。因为冀朝鼎在美国财界很有人脉，当时陈光甫也极信任他，而陈光甫与胡适关系极近。

当历史过了一个周期后，人们会发现有些历史人物人生道路选择的深层原因，可能会被一个偶然的细节说明，而人们也不得不佩服胡适识人之深的敏感。胡适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对谁是好的经济学家有直觉判断力，就在陈立夫认为冀朝鼎给政府经济政策出坏主意的时候，胡适向当时的翁

文灏内阁推荐了三位青年经济学家，一位是蒋硕杰，一位是刘大中，还有一位是吴景超，他们的经济学成就，现在世所公认，胡适的这个历史眼光绝非偶然，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经济学思想的关注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思想出了偏差，那经济思想也不可能正确到哪里。

胡适关心黄晖

胡适一生交游甚广，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晚辈，他在晚年和人谈话时会常常提起，黄晖即是其中的一位。

1960年1月20日，胡适和胡颂平谈话：“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4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961年2月14日，胡适又和胡颂平谈话：“今天是阴历除夕，先生到钱思亮家去吃年夜饭。在车上，先生对胡颂平说：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论衡〉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如果商务害怕不敢出的话，我可以替他写一篇序，你告诉他。汤用彤在那边（指大陆），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清算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505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借胡适的书影印了这两部著作。胡适认为黄晖《〈论衡〉校释》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这个评价极为难得。可惜黄晖后来命运坎坷，很少为人提起了。胡适一直关心黄晖，是因为黄晖治学的趣味和路径，恰合胡适内心的标准。黄晖校释《论衡》与

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方法相通。当时黄晖把所有能找到的《论衡》刻本全部收罗齐备，这个习惯最为胡适欣赏。可能是对黄晖早年跟随刘文典治学的经历印象太深，胡适知道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以为黄晖也到云南去了。其实，黄晖1949年后没有到云南，而是到了西北大学。

据黄河《黄晖传略》叙述，黄晖（1909—1974），字政庵，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读国立中国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读书时曾与胡适、刘文典时相过从，刘文典不仅在学问上帮助他，还在经济上关心他。当时胡适虽忙，但黄晖每访必见。黄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期间常为《皖报》写稿。1948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950年，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也请他到湖南大学任教。黄河在文章中谈到黄晖的命运时说：“长期凌辱，备受诬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4年8月遽尔谢世。死后所藏书籍和有关手稿都由遗属献交西北大学图书馆。”（操鹏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第237页，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6年）

黄晖《〈论衡〉校释》由胡适推荐，1938年曾在战时重庆出版，可惜黄晖在抗战后期才见到书。1954年，波兰汉学家来华访问，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论衡〉校释》，用缩微方式影印了一部。当时商务已同黄晖约议再版，但因政治运动迭来，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时，才将此书收入，这时黄晖去世已十多年了。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周一良去世后，我把他晚年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又重看一遍，感慨颇深。

周先生晚年的回忆录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完成的，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注意到，一是时间，一是地点。在美国完成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对于周先生来说，也真是人生的一次巧合。他40年代从哈佛学成回国，正是一生最好的时间，然而这一阶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最不堪回首，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与美国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哈佛七年的经历，就没有学者周一良，而没有晚年的回忆录，也就没有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周一良。周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反省，是他在晚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特别体现在他所写的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他90年代回忆陈寅恪，用了《向陈寅恪先生请罪》这样的说法，可以想见，其内心是多么痛苦。

青年时代的周一良，最为陈寅恪器重，但在50年代，陈寅恪最看重的学生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他的许多学生，在思想和学术精神上，都背叛了他。陈寅恪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就特别提到，他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就不是他的学生。在这次谈话中，他实际上批评了50年代周一良的选择，他说：“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他对50年代周一良的选择是很不满意的。周一良在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蒋天枢编陈寅恪全集时，把文章中与周一良当年论学的地方全都删除。周一良说：“对于旧作的

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自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50年代的周一良，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平衡，这是很令人困惑的。周一良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一二·九”运动时，他都置身事外。但五十年代初期，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选择了认同新时代，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有些难以让人理解。我曾在一篇分析王瑶和陈旭麓的文章中说过，这可能与他们正值青年有关，因为他们最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准备如果还想有一点发挥的机会，就只有妥协，不然自己就成了废人，那时他们还没有在学术界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对周一良来说，也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从50年代有限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可以看出，最活跃的，恰好是周一良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对新时代的认识和评价是真诚的，也是轻信的。按说，周一良是史语所出身，与胡适、傅斯年、赵元任他们感情很好。胡适曾给周一良写过极长的信，讨论他的论文，周一良还代他父亲送给过胡适戴东原《水经注》的抄本；周一良二儿子在美国出生后，他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感谢胡适的问候，并说：“我们想请您给起个中国名字（排行字是‘启’），希望长者的福德智慧他日能企及一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二十九册，481页）但在政治选择上，周一良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周一良1938年到哈佛，1946年才回来，可能对于国内的政治比较陌生，季羨林的经历与他大致相同，这正是中国的抗战时期，所以在他们本来的“原罪”意识当中，比别的知识分子又多了一层。下面这个材料可以说明一些情况。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

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 73 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个报告中，对于周一良是这样评价的：“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五四人，以季羨林为代表。季羨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地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他们现在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中起着骨干核心作用。一般缺点是有些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也还不善于进行领导工作。”（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49 页）1956 年的知识分子问

题会议，是较为开明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知识分子本来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但过了一年，就开始了反右。鸣放时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敢说话，其实与这次会议也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从这次会议上感觉到了他们的“早春天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不对的。周一良 50 年代的思想倾向，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基本前提的。1955 年，他在《历史研究》第 2 期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批判了他早年最尊敬的胡适和他曾在史语所中受惠颇多的傅斯年，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早年学术背景的基本否定。有趣的是，在该期《历史研究》上，紧排在周一良文章后面的是田余庆的一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周一良和祝总斌成为北大史学系最著名的教授。50 年代，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

怎样理解舒芜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画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他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

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生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珂德，他们是双胞胎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珂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几个同胞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

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珂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50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

“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名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绶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珂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

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我虽未进大学，却早

早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与为伍的。”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他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关键还是在于，中国30年代以至40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

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 37 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储安平与季羨林

2009年7月4号，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持了一个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不久，就传来了季羨林去世的消息，许多报纸、杂志要我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我都推辞了。倒不是自己无话可说，而是感觉世道日薄，在历史选择中，我们为什么总是对那些真正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东西不加珍惜，而对俗世的荣光倒很看重。我想起了储安平和季羨林。

季羨林是1911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20世纪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时，季羨林是封面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政府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羨林后来就没再写过。《观察》1950年复刊时，季羨林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

季羨林与储安平是老朋友。20世纪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羨林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发表这篇文章时，将季羨林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羨林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羨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時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

季羨林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我在1998年出版《逝去的年代》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小文章，曾谈到过季羨林的这个经历。季羨林后来与储安平的关系，我不很清楚，但想到知识分子在时代转移之际的选择，还是很有感慨。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表达过，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他认为“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储安平就是一个拙者，但也是一个贤者，我认为历史更应该纪念的是他。我们不好判断季羨林1949年后的顺应时代，是不是完全发自内心，但他选择了完全认同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却是一个基本事实。1955年底，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配合将要召开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搞了好几个调查报告，其中对北京大学的调查主要在文、史、哲三系，当时统战部按自己对新旧知识分子的理解分类，把季羨林划分在进步知识分子一类中，报告里有这样的话：“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五四人，以季羨林为代表。季羨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48页）在同一个调查报告中，钱锺书被划在“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里。

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选择，自有他们的道理，后人一般不好对这种选择妄加评论，但后人对完全赞扬这种选择中体现出的个人道德和人格，却有保持自己看法的权利。在储安平和季羨林的人生选择中，更具永恒价值的可能还是储安平，真正纪念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安平先生：

隔了时空，现在给您写信的是一位晚辈。

二十年前，我开始接触到您的著作并同时关心您的命运，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关于您的思想、人格和命运，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晚辈在此向您作一简单陈述，愿您在另一个世间能得些许安慰，这是始终关心您思想和命运者同有的心愿。

昨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您最早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以两千多元的价格为一个人买去，心里感到很欣慰，这一册小书，虽然是您青年时代的作品，但今天还被人关心，其实是对您思想和人格的尊敬，这本书其实早就重印过，对它的内容读者并不陌生，但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得到一本小书，我想还是为了保留对您的记忆，显示对一个有思想和人格的长者的怀念。

2009年7月间，我们在厦门大学纪念您诞辰一百周年，当时望华也从澳大利亚专程赶来参加，1966年夏间，你们最后分别，望华在困境中度过了十多年艰难岁月，后来远走他乡，此次专程回来，以表达对您缅怀之情，父子虽不能相见，但情感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望华在会上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这是您默默出走后，国内唯一对您的正式纪念活动。当时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也来厦门专祭，以表达同罹丁酉之难后辈的沉痛心情。她前些年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专门记述您和罗隆基先生的专文，

此篇文章传诵一时，至今时时为人道及。我还想告诉您的是，现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者，以您的生平及当年的《观察》周刊为研究对象，硕士论文多达几十篇。前几天我还收到了江西张国功先生的专函，他们出版集团已决定将您的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重新出版。

安平先生，从1966年您出走后，您的名字也曾消失了二十多年，直到1988年，戴晴先生写出了《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您才重回人间，又过了二十多年，虽然您出走后给人间留下许多谜团，但可以告慰的是，您的所有著述基本都重新出版，在知识界，特别是新闻界，没有人不知道您这位前辈，您事实上已重回人间并影响知识界的生活，您的许多名言，已长久流传。

安平先生，虽然您已重回人间，但世间对您的思想和经历还是充有许多谜团。您早年在上海光华读书的时候，当时徐志摩、张东荪、潘光旦、罗隆基等先生恰在光华执教，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您早年的思想应当说受他们的影响较大，但那时您也曾给鲁迅先生写过信，还给他主编的杂志投过稿。我想您青年时代的思想，可能一度还不清晰，对自由主义理想的理解和判断尚在模糊中。后来您到英国游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触到了哈罗德·拉斯基的思想，但他思想中最吸引您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更多是公正，是平等和社会主义因素吸引了您，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追求，使您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您一直在言论界，没有接触过实际政治，对于执政党真实处境的理解，可能缺少真实感觉。后辈有一个疑问：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出版，当时美国《读者文摘》曾专门介绍过，潘光旦先生还把它介绍到了国内。您那时正在重庆为筹办《客观》杂志忙碌，不知是否得读哈耶克的大著？以您早年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心，错过了哈耶克而执意于拉斯基，可能在冥冥之中为您好后来的命运埋藏了不幸的种子。当时吴恩裕先生也在重庆，他是拉斯基的入门弟子，你们时相过从，您在《客观》上连载了他的《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可见那时你们对拉斯基学说一往情深。1946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您满怀信心回沪创办《观察》周刊，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您发

表拉斯基文章最多，而没有注意到哈耶克的思想。后辈的另一个疑问是：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多次给胡适写信，让他为《观察》撰稿，但胡先生始终没有给《观察》写一篇正式文章，只是有一次更正了费孝通先生文章中的一处笔误。当时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胡适先生不给《观察》文章？当时他是有文章的，但都给了《独立时评》。是不是适之先生对您编辑《观察》周刊的基本思路有看法？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您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权是否批评太过激烈而没有想到这种行为可能有亲痛仇快的效果？

安平先生：1947年，您发表了《中国的政局》，此文现在已是一篇经典文献，你对当时政局的判断那么清晰，并明确说明了在一个政权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另一个政权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如此清醒的感觉和判断，为何您还要选择对好一点的政权更为不留情面的批判呢？这是否就是适之先生不给《观察》写文章的原因呢？因为适之先生不久说过，“在道义上我始终站在蒋先生一边”。1949年，那时《观察》已被国民党查封，您由上海到北京，在清华和费孝通、潘光旦等朋友判断时局，最后选择留下来，您对这个判断和选择有过反省吗？

安平先生：丁酉之年，您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点意见》的发言中，用了早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时创造的一个词“党天下”，您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但那篇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叹，这篇文章没有过时。丁酉之年的朋友，现在就剩下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和您还没有改正了。有一段时期，还有人在寻求改正，但更有明识之士认为，不改正更易于为历史记忆，这个判断，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安平先生，还记得您的老朋友季羨林先生吗？他小您两岁，2009年去世了。季先生去世后，《观察》时代列在封面上的撰稿人全部去世，一个时代落幕了。30年代中期，您编《文学时代》时，当时季先生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寄回了《表的喜剧》。您刊发时，把季先生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先生已在德国。您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羨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

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先生信中有两句话：“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这是他途经苏联时的感想，可他后来还是回到国内服务，而且比您更能适应环境，晚年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可惜他已发不出类似于当年你们通信中那样的感想了。如果有一天，季先生和您相见时，重闻当年的感想，回首前尘，不知你们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安平先生，最后我想把世间对您默默出走的疑问，再向您陈说：你出走后，至今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音讯。有人说，您在北京西山的青龙桥投河；有人说，您在天津跳海；还有人说，您在青岛跳海；更有人说，你逃亡苏联，也有人说，您在江苏出家抑或被红卫兵打死？这些推测，当然对您已毫无意义，我们的追问，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好奇，或者也是对您人生归宿的一种关切，安平先生，您在哪里？

安平先生：2000年8月7日，我曾收到江苏无锡余允中先生的一封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谢泳老师：您好！我就是8月1日给您打电话的读者。关于储安平的生死问题，我一直留意，因我在75年夏季见到的一个人，可能就是储安平。本来想总有人与我有一样的奇遇，等此人出来说见过储安平时再与他对证，以求真实。不然的话就是孤证，孤证总是难于定论的。可是至今未见这方面的消息（邓加荣报告文学里提到的与我见到的不相同，再说没有写明确的人，难以相互验证。）您在电话里要我写出来，我考虑再三，写出来也好，但不希望公开，只希望出现有人与我同样情况时，您帮着配合相互举证，想来在这方面您的信息来源广。

下面简单陈述如下：

75年，我17岁，上高中，对《水浒》着迷。因家庭成分不好，常被人欺负，所以对《水浒》里的好汉很向往，也想学一身武艺。由于少年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离家寻访山中高手，就像现在的少年看了武侠小说离家一样。在南京郊外的汤山遇见一位近似野人的老头，这人模样怪异，披肩

的头发和手脚上像鸡爪子皮的皮肤至今难忘。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身旁的一只破篮里放着蘑菇。我当时认定这老头有功夫，便开口要学武，此人听后果后一笑，说：“你还年轻，等三十年过后，火气全无时，再来学。”这样就与他接上了口。我问他高寿，他说120岁。闲语中，他的口音里有宜兴味，但不明显，因我是无锡人，与宜兴相邻，所以听得出来。当我问他是否宜兴人时，他表情异样，现在想来是引起了他的警惕，但异样表情很快就过去了，这样我们就谈起宜兴的人事物。其实是他讲的多，我只是虔诚地附和，当谈到宜兴的大姓——储姓时，他说了多名姓储的人的成就。后来他说：不过也出了一个右派，问我知道不知道储安平这个人。我摇头说不知，其实他提到的一些储姓人，我一概不知。现在回想起来，他提到储安平时，神情是复杂的。那天他的心情不错，也许好久没有与人交谈了，我还是年少无知，他少了戒心吧。他的一些话其实是在婉转地规劝我，有些话很是洒脱。后来回到家里，询问了储安平的情况后，第六感觉告诉我此人可能就是储安平，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储已失踪。从此我的感情深处有一种复杂情怀，这种情怀折磨了好一阵子。一星期后，出于少年朴素的义气理念，再到汤山，证实此人是否就是储安平，但遍寻不着。在一个山洞里见有破席破棉被等物，便坐在洞口等，天将暗时，仍不见有人来便下山。大致经过就是这样。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对储安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越想越觉得那人就是储安平。由于我的文字能力有限，再加上时过境迁，难以描述出当时的情境，一些细节也难于表达。我想汤山并不是深山野林，而且此人模样怪奇，一定还有人见过并记得，也许现在时机不成熟，待条件具备了，会有人出来说明的，到那时，我很愿意与之当面印证，以求证此人就是储安平。为此，我现在不想把我所见公开，以免影响将来印证时的真实性。

我的文字能力差，噜噜苏苏写了许多，给您添烦了，望见谅。

顺祝

平安！

您的无锡读者：余允中 8.3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和余允中通话的情形，十多年来也再没有联系，但我对他信中叙述的早年经历还是相信的。安平先生，您能回忆起曾经有过的这一段奇遇吗？您有没有文稿，以您特有的方式留存于世？如果有一天有人发现了，我们该如何判断？

宜兴储家，有一位储传能先生，今年也有八十多岁了，他在少年时曾见过您。2009年，他写了《储安平百年祭》，他说，早年曾与您有过交谈。他还记得“安叔与我等小儿谈及往事，眉飞色舞，自鸣得意”，他回忆说：

十多年后，发现磬山寺有一僧人，酷似储安平，亲友及好事者，群相探访，磬山寺是传说中朱三太子避祸之地，很可能真是储安平的藏身之所。可是人去楼空，斯人不在。有人问询于我，我想起了一段往事：祖父好佛，与僧人往来甚密，磬山寺福元法师是我家常客，他是武僧，一日来访，我等小儿请他略露数招，祖父笑而促之，乃同至庭院。福元猿臂轻舒，兰台梅花零落；袈衫暗转，空阶落叶如扫。安叔是日亦休假在家，当即愿拜福元为师，福元笑道：“你是大学生，风华正茂，到你不得已时找我不迟。”居然一语成谶。此僧果是安叔，为何避而不见，我想可能也许他是不愿连累他人，时隔多年，他居然还负疚于心！

传能先生文章中曾提及文革期间，您曾回家乡探亲，他还记得储家早年曾与佛教的关系，这是不是促成您在1966年选择无声离开都市，重返家乡，寻找自己心灵归宿的原因呢？

安平先生，家乡没有忘记您。望华来厦门时曾说，宜兴名人纪念馆中有您的位置，不过因为大家明白的原因，不事张扬而已。我们确信您的灵魂已经回到故乡，您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但您的思想和人格早已回到人间并永远激励后辈为你曾经的理想而探索追寻，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宁并保佑我们的理想实现。最后再告诉您一个消息，去年祥瑞先生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出版了，他在书中回忆了1949年，你们在清华和费孝通的交谈，他非常珍惜和您的友谊，还特别提到1950年复刊后《观察》的几篇重要社论，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我们过去都认为那些社论是您执笔的。您

《观察》时代的朋友，已都追随您去，希望你们重聚时，能再述各自的经历，回想意气风发的时代。

愿您安息！

晚辈 谢泳

2011年11月30日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二钱是钱锺书和钱仲联。

二钱关系以及和陈衍的关系，今人李洪岩、范旭仑、刘梦芙多有关注。特别是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及刘梦芙《二钱诗学之研究》（黄山出版社，2007年）中涉及相关史实至详至富。二钱关系与陈衍可判断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二钱关系，刘梦芙的判断是“疏而不亲”，陈衍在二钱中间。

钱锺书亲近陈衍，一生基本不说陈衍的不是，钱仲联也尊敬陈衍，但时有微词，《梦苕庵诗话》所记甚多，对陈衍编的《近代诗钞》很有意见。陈衍选近代诗，有他自己固定的趣味，但也极重人情，当时即为许多人诟病。诗选中闺人最多，把自己儿子和厨子的诗都选进去了。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曾开他的玩笑，张宗扬被命为“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评为“此脯椽也，小人张，主人衍”，并引章士钊诗说：“石遗老子吾不识，自喜不与厨师邻。”陈衍是有性情重人情的长者（钱锺书喜欢有性情的人）。其实陈衍何尝不知宗扬诗的好坏，他在《石遗室诗话》续编最后就专门说过“张宗扬读书至不多”，诗话最后一节还评论了张宗扬儿子的诗。与选诗，可认为容有不妥，与人际，则尽在情理，这可能恰是陈衍的可爱处。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对二钱诗均有评价，这已为一般熟悉二钱关系者所熟知，此不具引。

1984年，钱锺书出版《谈艺录》补订本，讲到黄公度的诗时，特别补

了一条：“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该书第347页，1984年），委婉表示钱仲联和自己的看法不相同。

1958年，钱锺书著文批评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这是二钱正面相遇的唯一公开事实，钱仲联没有正面回答，但也并没有完全接受钱锺书的意见，此后的往来就是相互尊敬和客气了。范旭仑读《容安馆札记》最细，他发现其中有两句对钱仲联的刻薄语，因是私人笔记，更见真实内心。二钱关系，可能从青年时代就约有隐情，或许与陈衍相关。

钱锺书《石语》开篇说：“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恍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

陈衍八十生辰，场面极大。《梦苕庵诗话》中有对此的详细记载：“乙亥浴佛日，为陈丈石遗八十寿诞。是翁老当益壮，强饭健谈，意态如五六十人。是日四方冠盖往吴门祝寿者，不下数十人。有堂会，其女弟子魏新绿演《文昭关》之伍员及《坐宫》之杨延辉，老伶工贾福堂演《捉放曹》之曹操，赵栖云演《女起解》之苏三，电影明星徐琴芳演陈宫唱《落店》，极一时之盛。”（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卷第284页）

“乙亥浴佛日”是农历四月初八，公历1935年5月10日，与《石语》所记相合，可见同一天二钱都参加了陈衍的生辰。《梦苕庵诗话》描述了这个盛大场面后，用相当篇幅节引了钱锺书父亲钱基博一篇寿文，这篇寿文多是对陈衍的赞颂，但也有批评。钱基博后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大体也是这个意思。陈衍认为“同光体”源自祁寯藻、程恩泽（《近代诗钞》首选祁寯藻），钱基博则以为“同光体”是由桐城派的刘大櫟、姚鼐到曾国藩一路下来，这才是“同光体”的诗学门径。这个学术见解，钱仲联和钱基博相同。所以钱仲联才说“此段论石丈诗至当，然亦不无弦外之音。”这个“弦外之音”即：“观其选定《近代诗钞》，意岂不欲开户牖、设坛坫者。何意嗣响无人，遂貽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同上第285页）

钱锺书喜欢陈衍，除了个人交往和个性方面的原因外，与他们二人均喜“谈艺”相关。钱锺书的特点是特别善于从中外大量文学艺术活动以及人类的一般精神活动中总结规则，发现相同或者相异的现象并进行深入阐释，此点与陈衍的艺术趣味接近，当然也与陈衍在当时中国诗坛的地位相关。《石遗室诗话》实为中国近代诗史，当时各派大小诗人刊印诗集，多数有陈衍题签题词和序文，此点钱锺书也未能免俗。

陈衍当时每周往无锡国专讲学一次，《梦苕庵诗话》记载：“石遗丈老矣，而精神矍铄，卜居吴门胭脂桥。每来复日，犹能来无锡国学院讲学，与唐蔚师有同年之谊也。丈故学者，诗特余事。然所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近于三十二卷之外，复有续辑。海内诗流，闻石丈续辑《诗话》，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以杖朝之年，而办此苦差，名之累人如此。”（同上第272页）

陈衍评价钱锺书时说过：“钱默存近作，余已略话一二，兹得其所印今年初刊诗一小册，有甚工者数首。”此即指钱锺书当时自印的《中书君诗初刊》，可判断为是钱锺书送给陈衍指正的。钱仲联对陈衍的看法却很复杂，他认为《诗话》续编中“前编所未收者，多见于此编”。也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和王蘧常，但没有提钱锺书的名字。钱仲联接着说：“欲知近十余年来诗风者，于此求之足矣。丈自言海内诗人奇到之集，已阅过者，殆满一间屋，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胜计。限于时间与篇幅，徒呼负负。俟补《续近代诗钞》时，当次第收入云。丈谓余诗多隽句，雅似其乡何梅生，又甚似海藏。此则丈但见余已刻之《二仲诗》，故为此言。后此所作，风格大变，殊不愿在闽人门下讨生活也。”这后一句话，对陈衍的不满溢于言表，似也可读出一点言外之意，陈衍喜欢钱锺书。

二钱均为中国极有成就的大学者，但治学趣味有异，为人处事不同，彼此尊重，但也时显个性。知二钱与陈衍关系亲疏，也可略见近代中国诗坛人事之复杂及趣味之高雅。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国内关于钱锺书早年文字生涯的史料线索，多数是范旭仑、李洪岩、刘桂秋等几位学者最早给出的，虽然当时因为发现史料的条件有限，下结论和判断非常谨慎，但现在看来，他们的判断多是准确的。比如钱锺书为其父钱基博“代笔”一事，刘桂秋《钱锺书为钱基博“代笔”考》一文，坐实了五篇钱锺书的“代笔”之作（见王玉德主编《钱基博学术研究》第3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所举三例，当时二例可以坐实，而认为《箫心剑气楼诗存·序》也是钱锺书手笔，未下确切断语，李洪岩抄录原序后说：“请读者来判断这篇序是不是钱锺书的作品，我们这里不下结论。”（见该书第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箫心剑气楼诗存》是无锡孙颂陀的诗集，孙颂陀名肇圻，字北萱，号颂陀、蒲石居士，是钱基博的表兄，工书善画，精于诗词，晚年避居上海，著有《箫心剑气楼诗存》等诗文集，另有《箫心剑气楼纪事诗》一卷，1943年铅印，此集由其兄孙保圻作序，以律诗叙生平，实为诗传，我曾在旧书肆购得一册。据孙颂陀诗中注释，他当时还有《癸丁剩稿》、《劫余草浣》、《蒲抱石轩诗稿》、《春水词》、《蒲石词》、《朴园笔记》等未刊著述。

《箫心剑气楼诗存·序》作于1931年，署名钱基博，据傅宏星《钱基博年谱》说，曾在无锡当地报纸刊出过。李洪岩判断为钱锺书“代笔”之作，主要依据是序言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见解，完全符合钱锺书的观点

和文风。李洪岩引述原序中有这样一段：“窃见近世之称诗者，多诵西江，其不然者，高谭盛唐。然而诵西江者，以主生涩为奥峭，而不知弓燥固贵乎柔。言盛唐者，以庸肤为高亮，而不知大含尤蕲细入。斯诚诗道之穷，莫若掾以清新，清则不涩，新则不腐。……然而清新之过，其敝为滑易，袁枚是也。诚以为宋贤黄、陈之前，先以宛陵、荆公，由凄婉出清新，斯不涉于倾泻。唐贤李、杜而外，饶以右丞、孟氏，由清新得深远，乃不失之寒俭。工而入微，迹象浑然。”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中有一节《孙颂陀》，也引了《箫心剑气楼诗存·序》中此段。陈声聪对孙颂陀诗的评价是“诗近平衍”，而对那篇序言却大加赞赏，认为“序文极高朗，论诗宗旨，尤契我心。”（见该书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陈声聪在文章最后说：“钱氏自谓不能诗，顾乃眼力过人，所论尤深中清季诗人之弊。”

陈声聪对中国近代诗坛艺文、掌故极为熟悉，阅尽沧桑，见多识广，本是诗人，又与老辈多有交往，他对这篇序言的评价，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是出自钱锺书手笔的一个旁证，至少是一种判断角度，因为此等识见，出自钱锺书手笔更顺理成章。

1934年，钱锺书自印《中书君诗初刊·跋》中曾说：“旧作答颂陀丈有云：不删为有真情在，偶读如将旧梦温。”可见钱锺书对孙颂陀的感情，有这样的感情，为其诗集代写序文，当是情理中事。

钱锺书的科举观

我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社会一般观念中，极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由国文到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始终是入选篇目，这不是偶然的，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对科举制度的基本态度，这个影响至今也还在人们的普通观念中。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是在学术界，更多提到的则是科举制度的好处，而对它的坏处则很少议论了。

凡一种制度在稳定周期内长期存在，必是好处多于坏处，因为人类智慧一般是择善而从。1905年，科举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说明这个制度本身的历史终结，表明这种制度的坏处多于好处了，这个大判断，一般不会因为小事实而改变。科举是在端方和张之洞手中废除的，而他们恰是科举中最成功的士人，他们看清了历史的大势。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度到晚清废止，一千多年间，这个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本身也在变革，但变到最后，依然逃不出终结的命运，这是时代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科举制度最为人称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相对公正，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识训练和道德养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让读书人的荣誉感真正成为一种内心需求，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讲过，明清两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中，贪官污吏较少。唐代名相刘晏的著名判断是“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宋代名相王曾对流内官与流外官的著名观察为：“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

不管怎么说，科举废除后，一般的历史观察，还是认为这个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如今想从科举中发现好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这个制度的心理则不免迂腐了。

钱锺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锺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

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石遗聊天，记为《石语》。陈石遗是举人出身，他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数十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驥驥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石语》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锺书此处下一批语：“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第355页）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锺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钱锺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围城》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钱锺书间接的评价，还有更直接的。方鸿渐和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第81页）《谈艺录》中也引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的话“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宋诗选注》序言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作官的门路”，书中介绍文天祥早期的诗，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到“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宋诗选注》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向不以为然，似可见出他对科举制的基本判断。

关于金礼仁

北京方西峰大姐为写她父亲方震中的传记，用了近十年时间搜集材料。期间遇到相关问题，她会在电话中问我一点背景材料。有一天她向我提起金礼仁，我说我恰好还多少知道一点他的材料，主要是他1949年后的遭遇，而西峰大姐感兴趣的则是当年金礼仁在西北战干团的情况。

金礼仁是陕西宁强人（1903—1968），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上校政治处长。1927年“4·12”后，金礼仁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赴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脱离共产党，追随陈独秀，抗战期间，金礼仁回到陕西。曾任《阵中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历任国民党军委会军训部西北游击干部二期上校政治教官、中央战时工作部训练团五期第十五大队训练委员会上校指导组长。

1949年后，金礼仁被派往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任教授。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以“屡任敌党政要职，参加托派无产者社”等原因，判处金礼仁有期徒刑14年，1962年，因病保外就医，1968年病故于兰州，终年65岁。

现在能查到的关于金礼仁的材料很少，如果不是有直接关系，一般不会再想起这个人。他是著名的托派，也曾是专门去狱中看望过陈独秀的人。金礼仁后来的遭遇，与中国大学里对政治课教员的选择要求有关，他个人的命运遭遇时代转型，最后逃不出悲惨的结局。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给西北局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加强大中学校政治教育并重视政治教员人选的指示》。这个指示一开始即提到了金礼仁。其中说：“据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西北师范学院李洪林同志向中央宣传部报告，西北各高等学校中的政治课，大多不健全。西北师范学院的三个专任教员中，有一金礼仁，是托派，前在西安国民党的训练团任教官，并系极端反动的刊物《抗战与文化》的编者。”（《宣传通讯》1951年第21期第1页）当时中共中央对大学的政治教育特别看重，在这个通知中甚至作出了如果政治教员不足，可以由各级党委来代办的决定。这个指示中认为“像金礼仁这样的反动分子只应当加以检举，而绝对不应允许他担任庄严的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要求西北局对金礼仁进行查处并将结果报告中宣部。

1957年12月，西北局宣传部以《西北局宣传部报告处理托派分子金礼仁的经过》的文件形式向中宣部作了汇报。这个报告讲述了金礼仁的经历，并记述了他在教学中的一些言论。据报告中说，金礼仁去西北师范学院当政治教员，是当时1950年8月西北师范学院张师亮教授在北京聘请教授时，经中央教育部介绍的。对于当时金礼仁的言论，报告中说：“金在年来的工作中，仍以其托派思想和观点教学，如在该校参加军干校的动员会上说：‘参加军干校是西北青年出头的好机会，西北上没有很大的人物，西北上掌握军权的多不是西北人。’在教学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的学说，在二十世纪就不合适了。’又说：‘资产阶级黄金时代过去了，将来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农民阶级黄金时代……’”（《宣传通讯》1951年第27期第32页）报告中认为，对金礼仁的行为和言论，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曾和他谈过几次，但他态度顽强，表示再无检讨和反省的必要，后被送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

费孝通的一封信

我在厦大中文系给研究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时，曾专门讲过几次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的“内部通讯”和“会议简报”制度。这两种制度设立的动机，我们一时不好简单判断，但这种制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保留了许多史料，这些史料不敢说绝对准确，因为凡编辑过的史料都可能存在被选择的可能，但这些“内部”史料相对公开的文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却是无疑的，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定不能放弃这个史源。掌握这个史源的好处，一是可以扩展史料，二是有利于帮助我们判断当时历史人物的真实处境和内心活动。在目前中国当代史料不可能完全解密的情况下，这个史源的意义应当引起特别注意。

1956年，中共中央曾试图调整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态度也引起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注意，费孝通是比较早注意到这个转变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后来写作《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及他1957年的命运，都与他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判断相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内部简报《代表来信》第36号（1956年7月17日印刷），曾刊出过费孝通的一封来信，编者加了这样一个题目：《要密切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费孝通代表来信》，全文如下：

为密切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联系，利

用他们在国外的讲坛，进行宣传，以加强国际统战工作事，特作如下的反映和建议，请转有关方面研究和采择。

最近看到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的考古学家郑德坤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宋蜀华的信。这封信很能反映这一类人的思想情况，也指出了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郑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留美，抗战时期在四川华西大学任教，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九四七年去英国讲学，解放后返香港，没有回国，也没有职业。后来应英国剑桥大学之聘，任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宋原是他的学生，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最近去信动员郑回国。这是他的复信（5月18日寄出）。

先摘录他来信如下：

“今早接到你4月25日的信，这是几年来一件很高兴的事。自从1951年离港来英，一直没有和任何国内的朋友亲戚通过信。转瞬5年，真像是充军西伯利亚似的。回国的人，大大、小小、老幼总不在百位之下。行前都答应给我们通信，但是别后便如石沉大海，连一张平安回到目的地的明信片都没有，能不令人寒心？去夏在荷兰汉学会上得遇翦伯赞、周一良两位，谈叙至快。周一良还替我买些参考书。前些日子人民日报载共产党新党员名单，他已被批准参加，所以我想他是例外吧！今天你的信真使我兴奋，希望可以长久有这类的信，客居异乡也不至于十分寂寞。……”

“关于回国一事，真是谈何容易？一家五口，破釜沉舟的由香港搬来。现在已上了轨道：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看家的看家，再搬动起来实不可能。但最大的矛盾还是我们的生活、思想及习惯的问题。试想四五十年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思想习惯都是陈旧要不得的。回国后假如学习不过来，那才自投陷阱。国内的进步，社会的改变，我们知之甚详。我们有人民日报、大公报、新华社每日新闻报告，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考古学报、历史研究及各种图书。祖国的猛进成绩使我们向往，使我们觉得做中国人的光荣。这样干他10年、20年、30年，现代化的祖国才可以建立起来的。”

“一时不可能回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在香港3年，1948—1951，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国，始终不得要领，剑桥的朋友听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请我回来。工作是永久性的，现在国内安定，便告辞回国，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周一良劝我退休后回国，那时老头子不免有‘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之叹了）。再者小孩们都在读书，刚上轨道。我们的东搬西移，使我们浪费了多少年月，似不应再打断他们的学业。……我的工作大部在东方学系及考古学系之间，课程是远东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陶器、铜器及雕刻书画等五种。学生并不多，前年还有位研究生。”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几点：

1. 这些在国外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爱祖国的，在国外长期作客，内心是有矛盾的。

2. 他们肯定祖国已走上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回国工作还有些顾虑，特别是思想上怕改造不过来。

3. 他们在国外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生活也不坏，要下决心回国，不是他们现有的觉悟水平所能做的事。

4. 我们在解放初期在这方面没有注意，有些曾争取回国的人，接不上头，受过困难，心存失望。

5. 他们愿意和国内友人联系，而国内的知识分子却对于写信出国有顾虑，以致使在外的人感到寒心。

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这些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工作可能不太容易，所以就不如利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讲坛，为我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服务。

建议办法如下：

1. 调查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服务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所在机关，所有地位等。这些人在国内就很容易调查出来，因为原来都是现在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亲戚朋友。

2. 有计划的指定他们的朋友中若干人负责联系。这样做，国内的知识

分子就有胆量公开和他们的联系了。供给他们书报，并报告他们亲戚朋友的情况。

3. 邀请他们返国参观，可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邀请，并保证他们参观后可以返回原任。最初他们可能还有顾虑，但有人回去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参观的。

4. 鼓励他们报告各国科学的情况，在国内杂志上用显著地位发表，使他们觉得在国内还能有地位的。

5. 鼓励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介绍国内情况，和批判外国人的谣言和歪曲的报导，供给他们可靠的资料。

依我估计，这类人为数是不不少的，在欧洲可能不少于百数，在美国更多。因此这项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1956年5月26日

从上面这个材料，我们不但可以判断费孝通当时的思想活动，同时也可以判断郑德坤来信中反映出的海外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郑德坤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31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科毕业，当时他做的论文是《山海经研究》，后来一度做过厦门大学历史系代理主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中载有关于他的相关信息。郑德坤给他学生的私人通信中表达的真实想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当时流落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清华百年，人们总会提起清华精神，或者总要把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清华与北大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谈论清华精神并比较北大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先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近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清华、北大在这历史中也随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清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单举个别事例或者就某些个人特殊的历史贡献来说明清华精神，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识逻辑，如果说清华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义，那么何以解释1966年“红卫兵”这个称呼产生在清华？何以解释清华在1966年一度成为中国混乱政治的中心？如果说清华为中国的科技贡献过重要的科学家，但同样清华也曾经把最有才华的物理教授徐璋本送进了监狱，还有著名的右派黄万里先生，一生在清华主流中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近年清华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许多政治家，但我们想到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我们不禁要问：清华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于清华精神？它和出身于其他中国大学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北大传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诘问。如果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那么文革何以在北大发生？北大如何解释林昭个人悲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笼统谈论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而只能以清华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体现出的某些精神侧面，来大体分析当时何种风格或者何种做事的习惯在

清华师生身上成为主导精神。清华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北大也有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曾经的辉煌，也都经历过耻辱。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他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旧清华和新清华的分界线在1952年，即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以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清华的历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1911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3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1909年，派了47个人去。第二次是1900年，派了70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竺可桢、赵元任。1911年还派了一次，有63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

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10年时间。胡适1910年到美国去，1917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1920年

以后，清华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1949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那时回来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80%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20%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2400万两。1906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士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观察到，在1900年前后，中国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士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

1909年，中国外务部和美国就达成了协议，把美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分39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100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不论退还庚款的动机如何，从结果上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们纪念清华百年，更多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

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大，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等等，九叶诗派有七个是清华的。王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 100 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我们已经纪念过北大的百年校庆，现在又要纪念清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武有孙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见一斑。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他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她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如果非要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去推断和分析，是很难有清晰、统一的历史的，或者说一所大学后来的辉煌常常与他初期建

立的历史是背反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清华大学的建立是美国文化影响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运，但无论我们怎么评价，美国在清华大学建立中起的作用，一般说来它的优点胜过缺点是一个基本判断，旧清华的这个底色是它的校风和学术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旧清华有所谓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用通俗的说法说是当时清华师生中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我是从已故作家钟道新那里听来的，钟道新是听他父亲说的。钟道新从小在清华长大，他的父亲钟士模先生是清华教授，一度做过新清华的副校长。这句话是：要在清华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国去。这句俗语，可以理解为清华的美国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当年在西南联大多数人的风格时，他认为当时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种暗合西方传统的习惯，即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精神体现在教授身上就是：1936年，当北平军警来清华抓学生的时候，学生姚依林愿意躲进教授冯友兰家，而冯友兰敢于保护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

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清华有自己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并不是每个时期的清华都体现出了“厚德载物”的气质，我们说清华精神，在旧清华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西南联大时期，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延续。比如教育部有统一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就上书教育部，认为学校长期积累，自有传统，不易轻易改变。当时要求担任院长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非要入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什么是清华精神，这些就是具体的清华精神。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大学。1949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大学，速成人才。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拆开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受美国影响很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中国知识分子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但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消失了。如果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更有中国本土特色，那么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则更多美国色彩，不论清华还是北大，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都已远去，今天有一点余绪，大概也只在民间了。

李拓之译《英译唐诗选》序言

厦门大学西村校门前，隔过马路，新建了几栋高层的教员住宅，楼下时常有卖旧书的小贩出没，我有时候到邮局办事，偶然在旧书摊前驻足。旧书多是常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读物，无多大价值，但也偶有从厦大教授家中散出的文史书籍，书价较京沪旧书价格远为低廉。我有次看到有一部分从李拓之家散出的旧籍，多为20世纪五十年代的出版物，以古典文学方面的为多，这些书后来多有重印，我一般不买，我只是看见上面多有李拓之的签名，倏忽间感到学者身后的悲凉，学者一生的积累，最后飘零何处，真是难以想象。我感觉学者一定要在生前把自己的书处理好，送给爱书爱学问的青年是比较好的办法。我从李拓之的旧书中拣了两种，一是潘伯鹰的《黄庭坚诗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版，此书我本有一册，再买是因为上面有潘伯鹰的钢笔题签：“拓之我兄教正伯鹰丁酉嘉平上海寄奉”。还有一册是弗莱彻（W·J·B·Fletcher）的《英译唐诗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再版本，前言旁边有李拓之用钢笔完整誊录的自己的译文。

李拓之其人，现在人们很陌生了。我到厦大教书前，专门查过厦大有史以来各科名教授的情况，所以对他稍有了解。他是福州人，1912年生，1983年去世，1957年在厦大曾被打成右派，发配泉州教书，1978年后重回厦大中文系，不过五年就去世了。他去世后，郑朝宗先生专门为他编辑了一本《李拓之作品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据书前郑朝宗先生

的序言介绍，李拓之出身世家，年轻时曾在福州组织过文艺社团，也编辑过报纸，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和邓拓是中学同学并是非常好的朋友，20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以无大学学历的身份回厦大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一是靠了傅衣凌的介绍，一是有郑朝宗先生的热情，还有就是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开放的胸怀。李拓之一生留下的作品并不多，早期有一些历史小说，后期有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我感觉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在旧诗方面。《李拓之作品选》中旧诗占了相当篇幅，他和邓拓气味相投，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相当深厚的修养，与老辈文人如柳亚子、潘伯鹰等也有交谊，这些在他的旧诗中多有反映，他有传统中国文人身上的一切优点，对旧诗、金石书画都有相当修养，这和邓拓非常相似。他青年时代一度也有革命经历，但最终这些革命经历和他身上的文人气息难以平衡，邓拓又何尝不如此呢？

李拓之这本《英译唐诗选》也是一册旧书，封面都没有了，是他自己用毛笔手书重写上去的，书前有一方他生前最喜欢的印章。《李拓之作品选》前面的照片部分，介绍说他生前有三方最喜欢的篆刻，我查对了一下，恰好这一方也在其中，且排在第一位。

弗莱彻在唐诗英译研究领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他有两本译著，第一本出版于1919年，英文名字 *Gems of Chinese Verse*，第二本出版于1925年，英文名字 *More Gems from Chinese Poetry*。

李拓之这本是1925年商务1919年版的再版。江岚在她的《唐诗西传史论》（学苑出版社，2009年）中评价弗莱彻，认为他是“以推重的态度和精神向英语世界专门译介唐诗的第一人。”据江岚在她的专书中介绍，弗莱彻（1879—1933）曾是英国政府派到驻华领事馆任职的外交官，因职务原因到过中国许多地方。《英译唐诗选》应该是其旅居中国期间，深刻感受到唐诗在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后着手进行的。《英译唐诗选》由耶鲁大学博士 H·L·Hargrove 于开封作序，书前有作者自撰的前言，并以作者1917年作于福州的一首题为《致李白与杜甫》的小诗开篇。

从我手边这本《英译唐诗选》的保存状况判断，李拓之肯定是非常喜

欢这本书的，我仔细阅读了他译的批在书边的序言和那首“致李白与杜甫”的小诗，感受到李拓之文字的优美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想象早年中国大学中文系一般教授的风采。《李拓之作品选》中不曾收入这篇译文和小诗，我想李拓之先生可能也无意拿去发表，他可能也只是因为喜欢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情，而把这段文字批在了书旁，我感觉李拓之的译文本身也是一篇美文，如果以后向西方用中文介绍中国唐诗，这篇译文真是绝好的文字。李拓之本人是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情和修养，让他的文字中不但充溢着浪漫的气味，更有一种音乐的韵律和浓厚的抒情气质，弗莱彻写得好，李拓之译得也好，真能让人有中国文化太美了的感觉。下面是李拓之的译文：

序 言

将这些小量诗选拿来出版，这倒并非没有胆怯的。一种译文从来无法和原文等同，更不如伪装的作品能模仿它的真彩。这格外是诗歌，从一种语言的精华和实质中它存在着高度的和最微妙的表达。

我们能够画花，对它的颜色艺术可以到达，但谁能描出它的香味？这些译文也正是如此。

我曾经精密地遵循这些诗句的原有形式，往往保持它的矩度，只是怕失去它的神韵和细致的优雅。虽然，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普通的外国人住在中国，能从我的精选中得到某些深入于中国人心灵和感情深处的观察力，如果中国人感到他们的名作，即使是复制品吧，对于来自远方的邻国人都发生了兴趣。同情是人类联系起来的带子，那么我的劳力将赢得补偿了。

下面的诗作是全部选自中国唐代（公元618至905）的诗集：它对中国的文明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在古代欧洲正当德国野蛮人横行之时，已经（在东方）流传这样精神的制品了，至于苏格兰人，可能还没有脱离蒙昧时期。

这许多诗篇实际是自然的写生，是中国伟大风景的爱好者的作品，它写于著名朝代的遗址和不可美人的追忆之中，是一种佛教徒的神秘主义加上往往是对虚无和非实有的盼望的曲调，人们可以从其中看到：太阳和月

光，星光和原野的风，都是友爱的，在这里是没有喧闹，骚扰、出汗和匆忙，作者们泛着轻舟，渡过无声的流水，经历和谐而静谧的景色，白云如雪涌溢山际，鸥鹭掠影长空，钟声隐约在密林的幽谷，芳草憩息于平原，炊烟袅袅在天边，一似炉香旋绕于佛座般的悠闲，这一切形成了中国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魅力——和平，这现有的诗篇对于战争的题材是憎恶的，这里并没有待而杀之，也并不致力于摧残，并无贪婪财富和土地的大欲，更没有社会阶级的差别，这里恰恰是以大自然的语言描画它人的生活，因为在中国文字中其实是没有抽象名词，中国人是向伟大的自然大师去借取词汇的，譬如爱这一字，是由香字所转化，它包含着美丽和芬芳；老年这一意义显示于我们的是落叶和凋零颜色的秋天，这样的比喻的手法我给以大写字体的记号，读者可以立即看到。

如果他能够，让他去想象古代的诗人们：怎样在长江上烟波浪迹，在岷山中风景流连，或是在桂林的急流里泛舟。让他在古刹里看月光高照于林涧，让他如曼弗丽般去寻觅瀑布的女神，或是让他在往古的废墟中去做破垒颓城的梦吧。于此，他将理解唐代诗歌的圣义，他将得到和平。

1965. 4. 6、在厦门、偶译

拓之

致李白和杜甫

致词李杜我来迟，
 绝域孤身问道。
 踟躅山迷瘴雨，徜徉人跨文虬，
 漫向那落霞散彩危峰秀。
 膜拜仙灵丹井上，似当年
 桥横虹影，浪拍江风吼，
 伤心华屋委荒丘，
 野瓦颓垣，曾是月光照，
 更玉萧凄咽，怨诉韶年渺！
 浅情应许，薄意难忘，

长忆汝匆匆，弹指余音妙，
古梦芳原犹绕。

拓之 译

李拓之身前极少译作，至少《李拓之作品选》中没有收入这方面的文字，他可能也不曾在英文方面下过太多工夫，但读他的译文也可体会文化修养的全面。自己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修养，李拓之的译文是不是准确传达了原文，我也不好判断，但我喜欢他的这两段文字完全是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过去有个感觉，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有非常朴实的一面，对于知识的态度特别诚实，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在我接触过的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几乎都有这种气质。我们这代人，从表面上评价，好像什么都懂一点，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一代。从形式上说，今天中国大学里的教员都懂点英文，但其实这方面修养好的人极少。我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和韩石山先生去李健吾先生家中，看过他的西文藏书，真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动力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一点做作。这个感觉，我在太原每见常风先生也能体会，他家里藏书虽然远不及李健吾先生，但书架上的英文书一看就知道，他对知识的热爱完全没有功利，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有时候想，今天中国大学里的文科教员，自己对知识和学术的兴趣与热情，远不能和前辈相比，不要说外文修养了，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又有多少真切的了解呢？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文史知识，但离修养还差得很远，因为知识可以现学，而修养却要在不经意间见出，是最骗不了人的。我把李拓之的译文抄出来，是因为对这位前辈的文字产生敬意，同时也对他的文化修养有内心真实的敬佩，我感觉，我们和前辈差太远了。

2010 年 6 月 9 日于厦大白城教员宿舍

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一、作者及其时代

要了解一本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先要把握住这样几个关键点：一是这本著作产生的年代，二是作者的学术背景，三是作者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四是时代对这本学术著作的最后评价。

如果用这样的思路来观察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其中有几个关系要特别注意。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一般都是在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时代下出现的，这些名著在1949年以后基本是被否定的，多数被批判过。这些名著的作者最后成为“右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通常完成于1949年以前，以后的学术贡献很难再达到早年的学术水平。

我现在要介绍的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就是这样一本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

凡一本学术名著必在学术上有创见，书不在厚薄，在于能给人启发。中国老一辈史学家讲历史，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的这本书只有两百多页，但看完之后，你就能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历史中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它的许多见解可能会影响你一生，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他观察历史的方法会让你终身受益。

在中国现代历史学者中，雷海宗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人，但他的著作

确能经得起时代淘洗，不是所有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都有这样的命运。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除了他的著作以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历史教育学家，何炳棣、刘广京、任以都等历史学家都曾出自他的门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又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及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回清华任教。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先后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因为学术观点而成为“右派”。

从雷海宗个人的简历中，要注意两个细节，一是他早年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经历，二是他在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经历。这两个细节是想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早期第一流的史学家中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主要是留美。二是在抗战期间集中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这期间的学术活动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如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等人的主要学术贡献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雷海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留学背景的意义在于这些学者的学术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背景。雷海宗的学术思想中有明显的斯宾格勒的影响。

说到雷海宗和他的这本名著的产生，还要简单了解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战国策派”。

这个“战国策派”的来源主要是当时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名为《战国策》，随后这些教授又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开了一个副刊名为《战国》。时间大体是在1940到1942年间。“战国策派”中的主要成员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和贺麟。关于他们的学术主张这里不及细说，大家可以参看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这里要强调一点，“战国策派”中的教授都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建立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对“战国策派”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应回到学术上来，以政治角度的评价是不恰当的。

二、书的版本情况

严格说来《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不是一本专著，它是雷海宗主要学术论文的一个汇编集。全书分为两编。上编的论文是抗战前三年间在清华完成的，主要发表在当时清华大学的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的杂志上。下编的论文主要完成于抗战前期。全书的完整形态是上编重，下编轻。上编偏重于历史研究，下编侧重于时论。上下编各有一个总论。最后有一个附录。虽然文章都曾单篇发表，但有一贯的线索可寻。书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书前有雷海宗一则短序。虽然书的篇幅不大，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都在其中，是他的代表作。商务1940年的版本是初版。

1989年湖南岳麓书社重印过本书，但现已不常见。

2001年商务又再版了这本书，并在附录中另加了四篇重要论文。

作为一般的阅读，这三个版本都可以选择，但以商务2001年版较为方便和适宜，作为研究则应选择初版本与另外的版本对读为最好。

《伯伦史学集》，是后人为雷海宗编的一本史学论文集，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另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敦书整理的《西洋文化纲要》，虽然只是一个讲课提纲，但从中仍可以看出雷海宗的主要学术背景。同时也可以参看王敦书200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贻书堂史集》，其中有多篇谈论雷海宗的文章。

在专业的学术论文以外，雷海宗还有许多其他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出版的《周论》上。

三、书的内容和特点

雷海宗是一个重观点轻叙述的史学家。这种风格史学家的特点是下笔简约，重思想和创见。不喜欢叙述常见的历史材料和人人皆知的历史过程，所以他的著作不多，但每篇却非常集中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观察。雷海宗说：“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

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第125页）

关于“中国的文化”，一般的著作很多，也比较容易理解。但关于“中国的兵”却较少为人特别注意。雷海宗认为历代关于兵的记载多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所以他这本书的用意在于要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特的文化精神。

雷海宗这本书是在抗战前后完成出版的。何炳棣在回忆他的清华和联大岁月时认为：“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陈列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何炳棣：《雷海宗的时代》，《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第6页）

雷海宗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上篇的总论中指出“大半是非议与责难”。他把中国文化中“兵”的精神最后失落，解释为“无兵的文化”，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26页）他认为，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雷海宗在评价王安石时说：“他认为只有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主。只就这一点来看，王安石已是两千年间特出的奇才。可惜王安石一类的积极人才在传统的中国绝无成功的机会。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

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怖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69页）

雷海宗的这本书虽然简略，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宽广。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特别有启发性。这本书的好处是对历史制度中最重大的问题，几乎都有独立的见解。作者是在观察世界历史的前提下，来评价中国历史的。只有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非常了解的学者才能有如此的把握能力。比如对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法关系、行政制度、中国的元首问题、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作者的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比如他对中国语言的评价是：“另外一个可能解救中国文化的势力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56页）

从雷海宗叙述历史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对世界历史又有相当的了解，二者融会贯通，所以谈论大的历史问题，却能娓娓道来，文风简约，非常好读。一本历史著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相当不易。他从现实和问题感受历史的视角，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评价。比如他关于中国士大夫和流氓的评价，对后世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也极有帮助。他认为，中国社会自汉代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他说战国时代，中国的士还不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做官捷径以后的事，隋唐以下科举制度的建立，才增加了士大夫的团结力量。儒人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并且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他们

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由此点出发，雷海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党专政在中国倒算不得稀奇！”（《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38页）

雷海宗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批评，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局面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39页）他说乱世士大夫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清谈，第三种行为就是做汉奸。

雷海宗认为，士大夫与流氓是同时产生的。太平时代，流氓无论有组织与否，都没有多大的势力，但唯一能与士大夫相抗的却只有这种流氓团体。流氓的经济势力在平时并不甚强，但患难相助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反较士大夫间发达，无形中增加不少势力。流氓团体也有他们的弱点，内中的分子几乎都是毫无知识的人，难成大事。形式上的组织虽较士大夫为强，然而实际上很松散。所以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间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

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又由流氓移到了士大夫手里。

一本六七十年前的史学著作，今天读来还能引人入胜，可见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会因时间和政治的原因而从人们眼中消失。雷海宗写得并不很多，但仅这一本著作就让人肃然起敬。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中国当代法治史上有个小问题，就是 1955 年建立学部的时候，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这是个简单问题，但又是个复杂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中国是帝制国家，农耕社会是主要特征，传统社会的治理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许多办法与现代法治相通，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这一点学术界有共识。法治社会，严格讲也是西方经验。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法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说，当时中国有见识的人，还是明白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法治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也是共识，法治比专制好，这不但是现代知识，也是现代道德，也是现代常识。

早期中国人对法治的理解，我个人以为相当成熟。我看过黄人编纂、1911 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一本《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其中有一个专门辞条：“法治国”。这个辞条的解释是：“对于专制国而起者。在专制国，统治者为君主，国权随意行使，不拘法规，纵令国权之行使有经规定者，亦只为君主所下之训令，而国家与臣民之间，无拘束之法规，是为绝对之专制国。专制国，亦有民法、刑法，民事、刑事之裁判，国家亦有拘束者，然行政权之行使，则无法规之拘束，反之在法治国，不唯司法权拘束于法规，即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不唯行政官厅，即君主与行政权之行使，亦拘束于法规。行政法，为关于国家与臣民之行政之法规，有拘束

之力，如此行政悉依法规者，谓之法治国。此行政法规之原则，依法律而定，在君主一方，不能任意制定变更，必得议会之协赞而后可，因此行政法规上，为治国之基础。凡法治国所定各条件，若行政官厅有背法规时，可以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方法救济之。”

进入“百科全书”一类书中的知识，一般是当时社会有普遍认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当一种外来的知识，成为中国人一般知识系统中的共同知识时，这些知识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而进入相关的“辞典”。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认同好东西在哪里都好的判断，东西的冲突和不适应，过分强调东西差异，其实常常是我们排外的借口，我们必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人生经验，这也就产生了共同的人生智慧。中国人的法治知识和法治观念，至少我们上引的那个辞条判断，可以认为相当成熟。我们法治观念的退化是1949年后的事。

1948年，国民政府就完成了中国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工作，对第一届中国院士的选举工作，当时和后来都有所批评，但人们公认这个选举大体公正，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个选举为后人称道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学术和政治的分离，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一向批评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都当选为院士。但这个传统到了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却放弃了。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刘大年回忆说，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他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他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羨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他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他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大家。当时提出的人选

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

1955年1月6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组建学部的工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进行了讨论。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238人，减至224人。中央审批时，又加了11人，最后名单成为235人。

科学院在给中宣部的信中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

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是：

1. 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
2. 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

3. 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

1. 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

职务而不能不用者。

2. 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

3. 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

4. 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

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

应该说，1949年前后，新政权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度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

1955年2月12日科学院在给周恩来和陈毅的一封信中认为，对于原中央研究的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没有承认，现在承认这些院士，他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如果把现在大陆的1948年选的院士都承认下来，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则对比之下人选就势必太多太滥，如选择不当反而会造成新的纠纷。”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渡形式。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

也有一个办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选举院长，再搞学部，由上而下，这样最不得人心。”

按当时的设想，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可以说学部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学部建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对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学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刚刚组建时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得特别严重。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是过去的两倍多。除了时代转换以外，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也就是说，1955年科学院学部建立以后，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机关中，已经完全没有法学的地位。

一般的理解是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取消了社会学和法学，所以原中研院院士陈达也不是学部委员。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高层不但没有法治观念，更没有对法治的敬意；当时取消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理由是有了马列主义，其他的知识体系就不需要了，这个判断中隐含着对知识体系的无知

和自负，也是一元化知识逻辑的必然结果。知识体系中取消了法学、社会学，学部委员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法学和社会学的恐惧，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无知的问题，而是垄断对所有复杂社会现象解释权力的一种选择，这也是专制社会对知识的一般态度，法学更不能例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一个解释：“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 Symbolique 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

一般社会科学的命运如此，法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1955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我们习惯于用爱国主义来判断1949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那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具体到钱学森，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者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

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1949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像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极权特征，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1958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意愿在人生智慧的意义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制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上报中央。

徐璋本 1957 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 20 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据严昌文章叙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2005 年 6 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道：“1958 年 4 月 19 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 8 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1950 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说不愿意让洗脑。1957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1979 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 1989 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霎那，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前几年，我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时，开始留意董时进这个人，但后来因为其他研究，没有深入下去，所获资料也非常有限。这几年，我的学术兴趣已有所转移，但在当年所留意过的那些历史人物中，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董时进，1900年生人，何时去世，我不知道。四川垫江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我只在《观察》上读到过他的一篇文章，但他那篇文章所传达的却是一个对历史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

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这样的认识，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四十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看问题，都能在两党之争中看出孰轻孰重的。在这一点上，董时进和储安平是有远见的。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董时进还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一九五零年复刊的《观察》周刊曾发表过一篇谈话纪要式的文章，名为《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观察》发表谈话摘要时，先有一个说明：“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这个谈话摘要，没有列出发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来代替。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董时进上书的原件，但我想这个原件也许还在世间，因为给毛泽东上书，总会在他的那些来件中保留下来。将来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档案，总会有人来重新评价那时的历史的。

我们从那个批判性的座谈会发言中，多少能看出一些董时进的意见。有一个发言的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

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得农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个他当年的同事说，董时进在国民党时期就反对土地改革，他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他未来的命运我不大知道，只是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专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时，能考虑到当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见。董时进当时提出的那些问题，有相当的专业性，也可以说是学术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朝历代，这都是最大的问题。四十年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有些农村，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工业化的苗头。而华北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农村的土地制度，确实不可同时语。董时进本人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在农业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听他的一家之言呢？我们不能说董时进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说他的那些看法绝对是有根据的，也是负责的。五十年代，在这些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还不是执政者没有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而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能为同行辩护，而且多数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他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重版后记

1998年，这本书印出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它还能有再印的机会。本书原就是一册当时写作的合集。那时，雄飞兄事业正在兴盛期，他想到要我来编辑一册小书，多是出于友情。他对此书不在意，我也不在意。说实话，我当时更在意的是它能带来多少稿费。

此书最初编辑时，我想把感觉多少还有些史料价值的文章都编进去，但结果并不如此。有些文章，出版方面通不过，我也只好妥协。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观察〉研究》主体部分能收入此书，是雄飞兄尽了很大努力才达到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他。当年雄飞兄主持“黑马文丛”的时候，参与者多是少壮青年，我虽然也忝列其中，但已不是青年，更不属“黑马”。当时这批丛书作者曾有一个在全国巡回演讲的系列活动，一度还被人称为是“踏雪寻梅”，虽然雄飞兄多次相邀，但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我人届中年，对浪漫活动早失兴趣。如今“黑马文丛”作者早已星散四处，还能和雄飞兄偶尔举杯的，大概我算一个。

2007年，我到厦门教书，偶然遇到一些好读书的学生，他们多数表示对这册小书留有印象，这令我稍感欣慰。如果这册小书能让有些青年对文史研究产生兴趣，或者因此对正统的历史有些怀疑，那我则是喜出望外了。

感谢德良兄一直催促我重版此书，没有他的热情，我不会再有兴趣做这件事。更感谢建刚、红梅夫妇，他们为此书的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因为《〈观察〉研究》后来已单独出版，此次重印将这部分完整撤下，另补充了一些还未结集的新文章。书名依旧，但应当算本新书了。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

作者

2012年11月23日于厦门